

中國邊政

第十六期

▲目 錄▼

從憲法中看邊疆政策·····	周 昆 田
近半年來之蒙藏施政·····	本社記者
海外蒙藏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參加十月慶典紀要·····	記 者
評兩本新版藏英字典兼談我們應有的努力·····	以 文
黑龍江地區及其名稱·····	胡 格 金 台
聖祖之御名、鐵木真及尊號成吉思·····	哈 勘 楚 倫
俄帝赤化下的外蒙古·····	VICTOR P. PETROV 著 林 佩 音 譯
西域塵談(六)·····	羽 田 明 著 宋 念 慈 譯
我創辦「綏遠文獻社」的想法和做法·····	李 啓 元
追念研究邊疆學者胡耐安先生·····	金 兆 鴻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從憲法中看邊疆政策

周昆田

中華民國憲法為我建國的寶典，一切制度和政策都導源於此。邊疆是國家的一部份，建邊與建國原屬一事，故邊疆政策亦應於憲法中求之。

一、基本原則

憲法的序言開頭便說：「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這就是說：這部憲法的制定，是以「國父」的遺教為依據，而以「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為憲法的精神所在。又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即是指出建設國家的目標，是基於三民主義而使其成為「民有」（民族的）、「民治」（民權的）、「民享」（民生的）的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即實施三民主義、建設國家成為三民主義的國家，為當前最高的國策。準此，則實施三民主義於邊疆，建設邊疆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之邊疆，應為邊疆政策基本的原則。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政治報告決議案中曾提示：「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既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唯一目的，則吾人對於蒙古、西藏及新疆邊省，舍實行三民主義外，實無第二要求。」正可為此一政策的註腳。

二、有關民族方面

我中華民國，係由中華民族各支系——漢、滿、蒙、回、藏、苗、僮、契丹等族所組成，除漢族多居於內地而佈及邊疆各地區外，其他各族則多居於邊疆，故言邊疆政策，首對民族問題必須有所處理，我們看憲法中的規定：

（一）各民族一律平等 國父致力革命，即在實現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想，良

以民族不平等為國家動亂的根源之一，必須予以徹底的消除，如民國元年九月三日 國父在北京五族共和進會西北協進會的講詞裏說：「緬維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為盛事。大抵革命之舉，不外種族、政治兩種，而其目的，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徵之歷史，世界革命有因種族而起，有因政治而起。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則？滿洲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佔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迫其他四族，滿洲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種族間之不平等等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又說：「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種族不平等之問題解決，政治不平等之問題亦同時解決，永無更起紛爭之事。」可見 國父對於民族平等的重視。現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也是符合 國父的主張，而使全國人民，對於國家應享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不因民族或種族的分別而有所分別，都是一律平等，毫無軒輊。

（二）各民族共同建國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三條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找邊疆各族同胞既生於國家領土之內，自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同屬國民，同為國家主權的所有人，也就是同為國家的主人翁，對於建國的責任自應共同負荷。 國父於民國元年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中演講時說：「我國以自由平等博愛三民主義，造成共和國，凡我蒙藏同胞首即當知共和國與國家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專制國家其利益全屬於君主，共和國其利益盡歸於國民，此即共和與專制之特異點。……蓋共和國以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故也。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國家參政權……將來國家立法，凡有利於己者，找同胞皆得

實成之；有不利於己者，同胞皆得反對之。」即我各族同胞，都為國家的主人，都有依法擔任各級官吏及民意代表的參政權，俾可共同負荷國家的責任，共同享受國家的利益。除關於地方的，將在各地方的自治法中予以規定外，關於中央的，官吏不限族籍，其民意代表之產生，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國民大會以左列代表組織之：一、略。二、蒙古選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別旗一人。三、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按後在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中規定為四十人）。四、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按後在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中規定為三十四人）。第六十四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以左列規定選出之：一、略。二、蒙古各盟旗選出者。三、西藏選出者。四、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而二、三、四各款「立法委員名額之分配，以法律定之。」按後在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中，分別規定為二十二人、十五人、六人。又第九十一條規定：「監察院設監察委員，……其名額分配，依左列之規定：一、略。二、略。三、蒙古各盟旗共八人。西藏八人。」這樣，集合各族才俊於中央級民意機構之中，羣策羣力，共謀國家的建設，全民福利的增進。

(三)保障邊疆各民族的地位 我中華民族雖由漢、滿、蒙、回、藏、苗、僮、契丹各族所組成，人數亦有多寡的不同，但彼此的關係，卻血肉相連，休戚相關，不僅不可「強凌弱，眾暴寡」，而且要團結一致，力謀共存共榮。關於此點，國父亦有所訓示，如在民國元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裏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又在同年二月「臨時大總統布告國民消融意見」裏說：「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這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相衷共濟，不與實業，促進教育，……務當消融意見，蠲除畛域，以營私為無利，以公益為當謀，增祖國之光榮，造全民之幸福。」這都是要結合各民族的利益於一體，以共謀發展。在民族主義第二講裏說：「這回我們中國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有代表來，……看見我們大會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可見對於弱小者的維護是國父一貫的主張。國父又在建國大綱第四條中規定：「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良以滿蒙回藏各族，多居於邊疆地區，人數較少，力量較弱，為使其能適應推行三民主義時代的新要求，更須加以培植，俾先在知能上與內地同胞不分軒輊，然後始易攜手並進，實行自治。到了憲政時期，憲法為照顧此一事實，於是在第一六八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更用「法」來保障人少力弱者的利益，防止其原有的民族地位受到多數者的排擠而有損害，以加強團結。至於將來究竟應如何保障呢？這在今日，當不敢

妄參末議，但大體說來，將是保障其憲法中所賦予的權益，尤其在選舉時保障少數者當選的名額，最關重要。

三、有關實施地方自治方面

國父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的首段，於說明地方自治的範圍之後，接著便說：「其志向當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目的。」在結論中又說：「民國人民，當為自計，速從地方自治，以立民國萬年有道之基，……以謀全數人民之幸福。」可見實施地方自治對於三民主義的實行及國計民生的推展，都非常重要，而民主憲政之完成，即以此為其基礎。當然，邊疆地區自亦應依據憲法的規定，實施地方自治，惟其中有兩個問題尚待研究：

(一)地方制度問題 按照憲法「地方制度」章（第十一章）的規定，我國地方制度有三：一為省縣（第一一二條至一一八條，第一二一條至一二八條），二為蒙古各盟旗（第一一九條），三為西藏自治制度（第一二〇條）。在邊疆地區，除蒙古各盟旗及西藏的自治制度外，還有沿邊的各個省縣，是在邊疆地區對於此三種地方制度都具而有之。關於已行省縣制度的地區，應如何實施地方自治，這在憲法第一一二條至一一八條及第一二一條至一二八條已有詳細而明確的規定，即依照中央制頒的省縣自治通則，次第推行。至於蒙古各盟旗的地方制度，在憲法第一一九條規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這個法律，當俟至適當時期始可制定，以便遵行。惟其中將牽涉到外蒙及盟旗的地位與匪偽竊據後變更建置的處理等問題，有待決策及立法方面的衡度。再對西藏的自治制度，憲法第一二〇條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揆其立法原意，似在保障西藏原有的自治制度，不予變更。可是，西藏自經匪偽竊據以後，先設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嗣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西藏原有的自治制度已被破壞無餘，是憲法第一二〇條所要保障的對象業經消失，將如何保障？這乃是一個問題。總統蔣公於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告西藏同胞書中有云：「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這當是將來制定西藏自治制度時所須遵循的方针。

(二)中央與地方權限問題 國父在建國大綱第十七條中規定：「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本此遺教，憲法因在第十三章內把「中央與地方之權限」詳加劃分，其第一〇七條所列的十三款，為中央權限，「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第一〇八條所列的二十款，立法權屬於中央，「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第一〇九條所列的十二款，

為地方權限，「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第一一〇條所列的十款，亦地方權限，「由縣立法並執行之」。綱舉目張，至為詳盡。惟此章規定，均係指中央與省縣的權限，在位居邊疆的省縣地區，自均包括在內，惟對中央與蒙古各盟旗及西藏自治制度的地區，其權限應如何劃分，則未見明文。這就一般法理上言，自可比照辦理，凡屬中央的權限便劃歸中央，凡屬省縣的權限便劃歸蒙古各盟旗及西藏自治地區，似甚簡捷而妥善；但就事實上言，將來如此辦理，能否適應此等地區的需求，似不無疑問。

四、有關建設方面

在過去的歷史上，對於邊疆的經營，有所謂：征服、和親、羈縻等等政策，其目的都不外是弱邊求安，而未注意到地方力量的培育。到了中華民國創立，五族一家，乃一改過去的積弊，走向積極建設的大道。國父的實業計劃更是為建國建邊，立下了遠大的藍圖。繼承國父遺志，實行國父遺教的中國國民黨，在歷次大會中，對於邊疆建設都有很明白的指示。憲法為完成此一時代使命，除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中的一、二、三、四、五各節為全國性的政策外，並特立邊疆地區的一節（第六節），其第一六八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予以扶植。」蓋既保障各民族之合法地位，以貫徹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同時並扶植其地方自治事業，以加速建設的進程。至於如何扶植其地方自治事業呢？第一六九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以扶助其發展；對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其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涵蓋實至廣泛，茲略加分析：

(一)教育文化 毋庸諱言的，邊疆地區的教育文化較內地略遜一籌，欲提高各族同胞的知能，培養地方的建設人才，自須發展邊疆地區的教育文化。憲法第一六三條規定：「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文化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邊疆有些地方，或亦包括在邊遠及貧瘠地區的範圍之內，自應由中央特予扶植，不能純賴其地方自治政府的力量。將來光復後，為洗刷匪偽毒化的渣滓，教育文化工作的加強，尤關重要。其外，尚有一點須在此一提：即邊疆同胞部各有其濃厚的宗教信仰，教育文化亦多植根於宗教，憲法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的規定，應特予重視。

(二)交通 我邊疆地區，除小部份外，大都是高山大漠，峻嶺崇峯，交通困

難，為其普遍現象，因而政令傳達，文化交流，貨物轉運，均受到嚴重的限制。為消除此等限制，自以發展交通為建設的首要。唯照憲法的規定，省縣級的交通屬於地方的權限（第一〇九及一一〇條的第一款），但非地方自治政府的力量所能勝任，必須由中央協助；尤其國父實業計劃中所規劃的各個路線，都遠達邊疆地區，關係國防與民生者至鉅，應以國家的統合力量，迅予完成。

(三)水利 我邊疆地區，有的係大江大河的發源地，水流湍急，有水利可以利用；有些地方河身平坦或滙為湖澤，可以航行、灌溉或魚殖；有些地方則天氣乾燥，雨量稀少，因而人口寥落，如新疆諺云：「有水此有人」可以見之。故欲建設邊疆，對於水利的講求，亦不可忽視，必須由中央協助，按各地不同的情形，作多目標的計劃，配合地方的力量，切實推行。

(四)衛生 衛生設施，為增進國民健康、保障國民生命最重要的工作，乃我邊疆地區，由於各種原因，甚感缺乏，以致一有疾病，則每乞靈於神祇，邊疆人口之所以稀少，這也是其原因之一。唯照憲法的規定，衛生亦屬地方的權限，但所需大量的物力人力，必須由中央協助提供，始克有濟。

(五)經濟發展 時當現代，經濟情況的良窳，不但表現人民生活的高低，也是表現國家社會的進步與落後，我邊疆地區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較之內地各省，顯呈偏枯的狀態，自應在中央協力下，以掃除過去的不良現象，而使其與內地均衡發展，使邊疆同胞亦能同樣地享受富裕康樂的生活。

(六)土地使用 我邊疆地區幅員廣大，地形及氣候各有不同，土地的使用亦異；有的使用於牧業，有的使用於農業，各地居民習慣既久，未可強其變更，過去邊疆所常發生之紛擾，其肇因於農牧問題的，為數甚夥；今後為懲前毖後，自應審度各該地區的「氣候、土壤性質，以及人民生活之所宜」，妥訂土地使用辦法，宜牧者不可強使之農，宜農者不可強使之牧，以保障各該地區的人民生活而發展其經濟，俾能安定邊疆，團結民族。

中國國民黨為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貫徹憲政，經於六十五年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政綱」共二十九條，有關邊疆方面，乃綜合憲法中各項要點，規定於第二十八條之內，茲謹將此原條文錄之於后，以為本文總結：

「加強邊疆建設，使其與內地均衡開發，本民族平等原則，保障邊疆民族合法地位及權益，尊重邊疆民族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制定自治制度，扶助其高度發展。」

現在，邊疆地區雖在共匪暴政實施之下，已造成了千古未有的變局，但將來光復大陸，重整河山，只須我們掌握這些大經大本的政策和方針，奮力以赴，當不難「撥亂世」而「反諸正」，其他若干瑣瑣的問題，亦均可迎刃而解。

近半年來之蒙藏施政

本社記者

立法院邊政委員會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在院內第二會議室，舉行本會期第二次全體委員會，邀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報告該會六十七年度上半年施政概況，茲摘錄其要點如下：

六十七年度行政院施政方針規定：「團結海外蒙藏及邊疆同胞，擴展反共愛國行動；培育蒙藏及邊疆青年，並加強蒙藏及邊疆問題之分析研究」。本會即根據此項規定，就職掌範圍慎重規劃，作為工作重點，積極設法推展。工作重點以外各項業務，也都持續進行，並致力謀求改進。謹就六十七年度上半年本會施政概況，報告於后：

一、團結海外蒙藏同胞擴展反共愛國行動

對海外蒙胞聯繫方面，在美國紐約組織有「臺北俱樂部」，按期開會，策劃進行各項反共愛國行動。本年美國國務卿范錫決定啓程前往該區，旅美蒙胞即由色德巴博士等以美國蒙古社區各界領導人身份，聯名致函美國總統卡特，反對美國與共匪勾搭，主張繼續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申言：「美國如欲為自由世界之領導者，則不應背棄多年之盟友。尤不可因顧條約義務與協防承諾，自貽國際地位之低落與傳統聲望之敗壞。」

旅美蒙古有爾滿濟特教授參加美國三千名學人簽名刊登於紐約時報之公開信，反對范錫赴匪區談所謂「關係正常化」問題。旅美蒙古學人王紹瑛先生，在美國俄亥俄州亞科隆市，以「中華協會」代表身份，要求市議會通過支持中華民國議案，並請其將此議案報告卡特總統。此事由當地之嚮導日報，以顯著地位刊載。

對旅居海外藏胞的聯絡工作，除於各地選派連絡人員外，着重以直接通信方式進行聯繫。海外藏胞情形複雜，現仍在設法溝通意見。旅印安康藏胞十三區反共團結委員會及西藏福利會，擁護反共國策，該會經常予以補助。本年初，其負責人慈珍木上書蔣院長與該會，請求進一步輔導其加強各項工作，該會正與各有關單位研究中。

本年十月旅居美、德、法各地蒙胞，推選代表十五人，組成海外蒙胞回國致敬團，以色德巴博士為團長，旅居美、加、瑞士、印度、尼泊爾等地藏胞九人，組成海外藏胞回國致敬團，（其中旅印、尼兩國之藏胞三人，因簽證困難，未能如期趕到），以薩迦教主為團長，前來參加國慶大典，並赴桃園慈湖恭謁總統 蔣公陵寢，南下參觀軍經文教措施，極為振奮，表示願將在國內見聞

轉告旅居世界各地蒙藏同胞。

二、培育蒙藏青年

該會對培育蒙藏繼起一代的青年，現已建立由求學到就業之一系列輔導措施。

在國民教育階段，該會特別注重其來日升入高中時，學業成績均能達到一般水準的問題。現今就讀於國中的蒙古學生，人數較多，該會特為成績不甚理想者，設有課業輔導班，輔導其在學業上打穩根基。就讀於國中的西藏學生，人數甚少，尚無設置課業輔導班的必要，遇有成績較差者，採取個別措施，使其補習。

受畢九年國民教育後，該會即依據「蒙藏學生在臺升學臨時辦法」，對志願升學者，會同教育部分發入學。六十六學年度，國中畢業升入高中者十名，高中畢業升入大專院校者八名。

目前在各級學校肄業的蒙藏學生，共九十六名，該會一律發給補助費，每人每學期七百元，成績優良者，並發給獎學金，以資鼓勵。

該會按期舉行蒙藏學生座談會，鼓舞其敦品勵學，並交換輔導工作意見。為使蒙藏青年學習其本族語文，並補助蒙藏人士分別設立蒙文進修班和藏文進修班。

蒙藏學生於大專院校畢業後志願出國深造者，該會輔導其參加留學考試。教育部於每年留學考試中，均設有蒙藏公費生一名，六十六年度錄取藏籍學生意西卓瑪。蒙藏出國深造的公、自費留學生，到目前為止共為六十人，在國外均堅決反共，表現優異。

蒙藏青年於大專畢業後，條件優良者，多已得到適當的發展機會，其未謀得職業者，由該會洽請青年輔導委員會優先輔導就業。對於就業條件不甚充分者，則設置就業輔導金，使之充實就業條件，隨時尋覓就業機會。

為鼓勵蒙藏青年參加各項公職考試，該會於本年度頒訂「鼓勵蒙藏大專畢業青年參加公職考試實施要點」對參加高考或相當高考及格者，發給獎金叁萬元，對參加普考或相當普考及格者，發給獎金壹萬元。此外，並與銓敘部、人事行政局磋商蒙藏青年任職之辦法。

三、加強蒙藏問題之分析研究

該會「蒙藏資料中心」在蒙藏資料蒐集方面，已逐步開展，除在國內與新書局和舊書坊保持聯繫外，並在海外委託蒙藏人士採購，同時和專賣遠東各國問題書籍之圖書公司建立關係，隨時將有關書目寄來，以供選購。本年蒐集具有參考價值的中外文書籍七百餘冊，連同以前所購置者，共一萬兩千餘冊，另有徵捲資料兩千餘種。

上年度本會繼續進行輯錄「十二朝東華錄」、「大清會典」與「中華民國政府公報」、「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蒙藏資料工作，其中「十二朝東華錄」和「中華民國政府公報」部份，業已完成，約計五百萬言，現正依體例編纂，可望於六十七年初付印。

外文資料之翻譯工作，則已完成日文書籍四部——「蒙古社會經濟研究」、「蒙古之政治和經濟」、「現代蒙古」（今日外蒙古），「草原與革命」（外蒙古），英文書籍一部——「外蒙古及其在國際間扮演的角色」，合計約一百萬餘言。

關於蒙藏匪情研究，經常向各方交換及蒐集資料。現有匪版「人民日報」、「大公報」、「人民畫報」及國內情報機關編印之「共匪廣播輯要」、「共匪地方廣播」、「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七種報刊。同時在國外蒐購共匪、蘇俄以及自由國家出版與蒙藏有關之書報。每月選擇其重要部份，編刊「蒙藏地區敵情月報」一期，分送有關機關及人士參考，並隨時進行蒙藏地區共匪動態之研究。

海外蒙藏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參加十月慶典紀要

記者

旅居美國、法國、西德等地蒙胞，為參加祖國六十六年十月各項慶典，經推選色德巴博士等十六人組成「旅美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於十月四日起陸續返國，代表團長色德巴博士返抵國門時，即發表該團書面談話，此項書面談話全文為：

「我們是旅居美國、法國、西德蒙古族人所推選的代表，回國來參加六十六年國慶及十月各項慶典。

現在國際間姑息氣氛仍在瀰漫，公理正義尚未伸張，我們蒙古族人熱愛國家，支持政府，向不後人。今天鄭重表明：在反共復國大業中，蒙古族人將擔負起所應盡的一切義務，既不瞻前，亦不顧後，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廿幾年來，復興基地——台、澎、金、馬，在蔣總統、嚴總統暨蔣院長英明領導下，政治民主、生活自由、經濟繁榮、社會安康，已奠定消滅共

該會并在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設置研究蒙藏語文之獎學金，在該校邊政研究所及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設置研究蒙藏問題之獎學金，鼓勵青年學子，進行蒙藏研究工作。

四、加強宣傳與對匪心戰

為報導國策政令，該會編印之不定期刊物「蒙古通訊」，已發行七期。此外，並補助在印度出版之「藏文中央週報」，對海外及大陸藏胞加強宣傳，以提高其反共意識。更隨時針對蒙藏地區匪情，向中央廣播電臺提供蒙藏語廣播稿件，並約請在臺蒙藏政教領導人士，於紀念節日作號召性錄音廣播。

此外，特就歷年總統蔣公重要文告及政府重要文件中，有關反共政治號召部份，節譯為蒙文、藏文，印製傳單，洽請有關機關向大陸蒙藏地區，實施空投、空飄。

五、輔導在臺蒙藏同胞

團結蒙藏同胞，首應關切他們的利益和照顧他們的生活。該會對老弱鰥寡、無謀生能力之在臺蒙藏同胞，按月發給生活補助費，一年以來得到補助的蒙古同胞計三十六人，西藏同胞計十六人。對疾病殘傷無力就醫的在臺蒙藏同胞，依其情節，隨時發給特別救濟金，一年以來得到救濟的蒙藏同胞合計八十五人次。

匪、光復國土的堅強基礎，為大陸上八億苦難同胞希望的寄託，尤其我們有裝備精良、戰技精進、實力壯大的國軍，這更是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最有力的保證。

我們旅居美歐各地，每次從報導上獲悉，我政府在國際不景氣的風暴中，依然保持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便感到無限的歡欣鼓舞；而全世界對我政府的正確領導，以及全體國民的一致努力，所達成的經濟發展，也目為奇蹟。

反觀大陸匪偽政權，早為八億人民所唾棄，而其控制人民的匪黨、匪軍也正逐步的瓦解，自從毛匪斃命後，其最高階層的奪權鬭爭，更愈演愈烈。大陸同胞紛起反共，推翻暴政的日子，已不在遠。

所不幸的是近幾年來友邦美國，竟有人主張聯絡這個行屍走肉的共匪，以對抗蘇俄。這不僅打擊中國大陸上八億人民反奴役、爭自由的願望，而且敗

壞美國自立國以來維持公理正義、為舉世稱讚的聲譽和地位。所以當美國決定派國務卿范錫前往匪區時，我們旅居美國的蒙古族人，由各社區的領導人於本年八月十五日聯名致函卡特總統，促其即行中止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並遵守條約義務及協防諾言，加強與我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我們深信正義的呼聲，終將喚醒人們道德的力量。

今天踏上復興基地芬芳的泥土，內心有說不盡的興奮。我們又帶着所有旅居美國及歐洲各地蒙古族人的意願前來，就是在 嚴總統和 蔣院長的英明領導下，早日達成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

旅居歐、美各地藏胞，亦為參加祖國國慶及十月各項慶典，經推選紅教教主薩迦吉達喇達欽先生等六人組成「海外藏胞回國致敬團」，於十月初返抵國門時，由致敬團團長薩迦教主發表書面談話，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雙十國慶，是我們國家光輝燦爛的大喜之日。我們是旅居美國、加拿大、印度、瑞士、尼泊爾的西藏同胞，今天回國與國內同胞共同慶祝這具有繼往開來意義的開國紀念日，感到非常榮幸和愉快。

我們政府在復興基地的台灣，進行各項建設，已有輝煌的成就。政治開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民生樂利，為舉世所讚揚。而竊據中國大陸之匪偽政權，二十餘年來專制獨裁，恣顧人權，實行恐怖，摧殘民命，內部則奪權鬭爭，紛擾不休，對外則威脅利誘，製造暴亂，這是有目共睹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事實。我們大惑不解的是有些因民主自由而自豪，且以重視人權為標榜的國家，居然會無視這種事實，倡議與共匪政權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此種與虎謀皮的思想，違反道義的行動，我們堅決表示反對！

我們旅居海外藏胞總數約九萬人，絕大多數是民國四十八年西藏抗暴時與共匪暴政正面作戰的英勇戰士。西藏同胞的未來命運和全國同胞的未來命運一樣，完全繫於我政府反共復國的前途。相信加強國內外各族同胞的反共大團

結，必能摧毀共匪暴政，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

際茲雙十國慶前夕，願表達海外藏胞的心聲，預祝我們的國家國運昌隆，反共復國勝利成功。」

兩團抵台後，隨即展開活動，及十月十日參加國慶大典，目睹祖國軍民團結自強，均感興奮，嗣於十月十三日赴南部參觀軍經建設，十月十四日上午赴鳳山參觀陸軍基地及陸軍健兒戰技表演，咸感陸軍戰士健壯之體魄與整齊劃一之戰技，實為反攻必勝提供最佳之保證。下午參觀中船公司及中鋼公司，目睹祖國重工業之飛躍成就，益增其復國必成之信心，次日上午赴台南參觀空軍基地，除對空軍健兒嫺熟之戰技表演嘆為觀止外，更實際參觀本年七月七日反共義士范園焱駕機來歸之飛機及有關照片，更確信匪偽暴政必亡，而色德巴博士及薩迦教主兩位團長更代表全體僑胞，接受空軍基地軍禮歡迎。

代表團返回台北後，曾參加立法院邊政委員會茶會，並先後蒙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松年、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谷理事長正綱賜宴，席間色德巴博士及薩迦教主均曾發言，一再強調旅居美歐各地蒙藏同胞均一致支持政府反共國策，誓為政府後盾，極受毛委員長及谷理事長之重視。此外，並曾拜會執政黨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等機構，以申敬意。十月廿六日兩團團員分在色德巴博士及薩迦教主率領下，赴慈湖向總統 蔣公稟報致敬，此後代表團團員即因僑居地工作繁忙，陸續返回僑居地，但蒙團團長色德巴博士、旅西德蒙胞丹僧先生及旅美蒙胞班巴先生藏團團長薩迦教主等均仍留台北，等待參加十月卅一日總統 蔣公九一誕辰紀念會。

本年海外蒙藏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各代表目睹祖國日益精壯，除一致表示興奮外，並願將在祖國見聞所及，轉告旅居海外全體蒙藏同胞，以堅定其反攻必勝、建國必成之信心。

評兩本新版藏英字典兼談我們應有的努力

以文

書名：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upplement

藏英字典（附增補）

編者：Stuart H. Buck

出版者：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C.

出版時間：一九六九

書名：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現代藏文藏英字典

編者：Melvyn Goldstein

出版者：Ratna Pustak Bhandar Kathmandu Nepal

出版時間：一九七五

自從達氏 Sarat Chandra Das 耗時十二年，於一九〇二年出版的藏英

字典問世以來，以其詞彙豐富、舉例詳盡，一直為研究西藏語文的人士奉為範典，人手一冊。但隨着藏文普及性的提高（按：藏文本為翻譯梵文經典而製作，自公元七世紀西藏正式有了文字以來，藏文也幾乎一直留滯於闡釋佛教經論為主要作用的階段）和藏文原有的詞彙不足以應付現代人文與自然科學之實際困難，因此新的詞彙也隨之不斷出現，達氏的藏英字典已有一「過時」之嫌。一向在西藏學研究領域中藉着無名的美國，近年來對西藏語文的研究已頗有成績。一九六九年巴克 Stuart H. Buck 編著了一部藏英字典，繼之於一九七五年又有梅爾文·戈德斯坦 Melvyn Goldstein 的「現代藏文藏英字典」的出版，這兩部新版藏英字典的相繼刊行，正從事西藏語文研究的人士自然先睹為快，而於藏文略識之無的筆者，更是求之若渴。

巴克的藏英字典列為華盛頓天主教大學亞洲語文出版品之一，係打字照相製版，全書共八三三頁，內含增補六十六頁，共收錄約近二萬個字彙。編者在諸論中曾說明字彙的取捨標準：

「本字典的初步目標是就現行一特別是出現於中共的一藏文出版品中所使用的字彙提供充分而正確的定義；然而，這並非意味，口語或古典藏文的特有字彙將遭受忽略，但數以千計列入其他舊字典或辭書中的一些詞彙則因過於晦澀或不切合吾人目的者則予省略。」

這部字典對重要的文法字舉例稍多，尚稱「堪可實用」。儘管緒言中對所有過去出版的藏文字典一一評列，洋洋灑灑，但實際上在編纂本字典並未化下多少功力，因此讀者仍須藉助於達氏和葉斯開 H. A. Jasche 的藏英字典，若干詞義的解釋也標註了請參閱上述兩部字典。編者似乎着重於大量收納共匪術語，對中國人而言，不免深感不解。其實，昧於「存在就是事實」是西方人對共匪認識所犯的通病。共匪在偽「西藏自治區」加強推行藏文，一方面藉藏文的流通以便灌輸藏胞思想毒素，另一方面則將漢文詞彙大量音譯強行注入藏文中，來破壞藏文原有的優美，以達其摧毀民族文化，消滅民族意識，從而徹底統治邊疆民族的終極目標。西方人徒然抓起藏文版的毛匪語錄、民族畫報、紅旗雜誌，以為就是通行於西藏的文字，便照單全收。這種例子充斥於巴克的藏英字典中，舉不勝舉（共匪術語尚不包括在內），譬如：*tu-ge*（五四頁）、*o-gag-sha*（八〇七頁）、*ag-ge*（八〇九頁）、*ge-ge*（八八三頁）等根本就是漢文的「唱戲」、「加速機」、「汽車」、「細菌」的譯音，斷非在語言文字自然演變過程中，由於本身詞彙缺乏，不得不加以容納的「外來語」，實令人為之氣結。

「現代藏文，藏英字典」的編者梅爾文·戈德斯坦為美國紐約市人，一九三八年生。一九六八年畢業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所修博士課程，以人類學為主修，西藏語文為副修，博士論文題目為「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

cal System) 。戈德斯坦現任教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一所名叫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私立大學，且繼續研究現代藏語。戈德斯坦曾與現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藏籍學者昂旺諾囊 (Ngawang L. Norang) 合作，於一九七〇年出版了一本「現代藏語，拉薩方言會話續本」(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 。其夫人群珍 (Chunden) 女士是在台灣故世的蘇康噶倫的外甥女（註：本段資料節引自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龔雨波的碩士論文「西藏婚姻制度之研究」）。戈德斯坦復由噶西澤仁多杰 (Tsering Poye Kashi) 協助，於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一本「現代文語藏文」(Modern Literary Tibetan) 。Literay 亦可譯為「書面語」，當然「口語」Spoken 或 Colloquial 相對而言。繼之於兩年之後出版的藏英字典當是他對現代藏文研究的作品之一。

戈德斯坦的藏英字典共一二三四頁，藏文詞彙原文係手繕照像，附以現代拉薩方言的羅馬譯音，例句則以羅馬字母對音譯寫，想必是藏文手繕費時，以英文打字又可減少排印上的困難。這套對音採自 Turrell Wylie 的「標準藏文羅馬字母對音表」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已廣為各方採用，原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哈佛大學亞細亞研究學報二二卷，二六一—二六七頁。

戈德斯坦的藏英字典比巴克的藏英字典內容要豐富得多，解釋、例句亦是詳盡。編者稱本書收錄了約三萬五千至四萬個現代詞彙，其中很多例句即取自達賴喇嘛所著的「吾土與吾民」藏文本，自無容置評。所謂的現代藏文較顯著的特色，就是複合詞的大量增加。根據語言學的分類，藏語和漢語同屬「孤立型」、「單音節」的漢藏語系，即沒有字頭字尾的變化，基本上是單音節，一字一義，但為求詞意的精確，必須藉着將單音節的字加以結合，融鑄為複合詞，亦為現代漢藏語系演變的共同特徵之一。

關於藏文的發音，依照藏文字母創製人吐米三菩札的藏文文法，根據藏文字母發音的強弱區分性別，對拼音的原則，曾有嚴格的規定。但千餘年來，已發生很大的演變（請詳參辛勉先生的「藏語的語音特性」一文，載師大國文學報第六期，二二七—二二七頁六十六年六月出版），因此統一現代藏文發音標準亦屬必要，過去研究西藏語文的學者，祇作方言的調查與比較，戈德斯坦正式以現代拉薩方言為注音印入字典是一項新創，對於初學藏文的人確有方便之處。

向來西人研究藏文文法，概以西文文法的模式套入藏文，往往格格不入，為葉斯開 Jasche 的「藏文文法」便是一個例子，使人對藏文的結構無法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因此介紹藏文文法，必須依從西藏文法學者的思想，而揚棄英文文法八大詞類的模式，何況吐米早在公元七世紀創製藏文之同時，也為西藏人自己編定了藏文文法原典？戈德斯坦的「現代文語藏文」一書，對藏文文

法的介紹尚不落前人窠臼，相當詳盡而細緻，值得推荐。戈德斯坦認為藏文的動詞有異於英文，例如英文動詞的兩分法「主動」(Transitive / intransitive) (Active / Passive) 和「及動」、「不及動」(Transitive / intransitive) 在藏文裡便沒有實切的相稱者，而將藏文動詞代以Active 或 involuntary 所謂的Active (致動) 是表示「由動作者施為的行動」(Action done by actors) • involuntary (不隨意) 是表示「無意的、無目的的行爲或狀態」(unintentional, non-purposive action)。按藏文動詞的分類視「與另一個動作者有無直接關連」而定。「Active」可與藏文的「與另一動作者有直接關連的」(ཉེ་བུ་ཤེད་པའི་འཕྲུལ་གྱི་འཕྲུལ་) • 「involuntary」與「另一動作者無直接關連者」(ཉེ་བུ་ཤེད་པའི་འཕྲུལ་གྱི་འཕྲུལ་) 相當。舉例言之，藏文表示「轉動」的詞有二個，一為འཕྲུལ་，必須有動作者實際操作，一為འཕྲུལ་則無須有另一動作者實際操作，自然而然地轉動。又藏文不屬於動詞的其他「名」འཕྲུལ་，可在該名之後加上表示「作」的助動詞(如ཉེ་བུ་ཤེད་པའི་འཕྲུལ་ 等字) 成為動詞也就是戈德斯坦所稱的「動詞化」(verbalize)。但戈德斯坦對藏文中表示「自動」འཕྲུལ་與「他動」འཕྲུལ་(按：又曰「能」ཉེ་བུ་ཤེད་པའི་འཕྲུལ་略似英文的主動與被動，藏文的被動係以未來式表示之) 的方式，似略而未提。此外關於未來式的表示法也過於簡略，如藏文的འཕྲུལ་字，除了作為「改變、變為」的意思外，而是用於表示未來式的一個重要的助動詞，在他的藏英字典中的這個字(二五二頁)，對此則未有舉例。戈德斯坦固然介紹以口語為主的現代藏文，但對西藏固有的文法形式不應忽略。在原文本的藏文文法的第二部「性轉領」(འཕྲུལ་གྱི་འཕྲུལ་) 就對藏文動詞的時態、「自」、「他」與「能」、「所」有詳盡的解釋，仍望戈德斯坦先生詳加參考。

一如巴克的藏英字典，戈德斯坦當然也大量引據了匪版的藏文資料，例如其中一九六四年北京版的「漢藏詞匯」完全是匪所謂的「社會主義名詞」，蒙藏委員會便從日本購得一本，筆者以為這些詞彙在對匪藏語廣播和印製空飄傳單上似可參考運用以收以敵制敵的效果。

去年十月執教於美國賓州大學的張澄基教授回國，筆者曾慕名求教，張教授曾說：「二十多年來政府竟未能在台出版一部藏文字典」。言下不勝感慨系

黑龍江地區及其名稱

黑龍江地區在北平東北三千二百七十七里，清時與奉天吉林合稱東三省。清設黑龍江將軍，初駐瑯璁，旋移至墨爾根，最後移駐齊齊哈爾。分設墨爾根

之。在國內，除了政大邊政研究所與民族社會系設有藏文課程算是聊備一格外，直正有興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而一以貫之者實為鳳毛麟角。邊疆研究因出路問題使人裹足而沒落，而資料尤其是工具書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民國二十二年由青海省政府根據達氏的藏英字典，擇其實用者編印了一本「藏漢小辭典」，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事件後，蒙藏委員會自日本書肆購得一部影印出版，近年該部辭典已暗完，未再印行。六十五年中國內學院依故方東美教授的建議，為擬研究西藏佛學而開設了藏文課程，基於研習的需要而由華藏法施會與淨空法師捐資徵得蒙藏委員會之同意將該會「藏漢小辭典」影印重刊五百部，無異是一大喜訊，惟不久該項藏文課程也僅曇花一現，因故中綴。前年中國邊政協會為提高國內人士研究邊疆的興趣，感於蒙藏維等邊疆語文的字典亟待重編，經理事會決議通過三種語文同時並進，承當時理事長阿不都拉先生熱心奔走，曾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原則允予補助編印，當由政大邊政所與民社系擬具計劃預算送核，結果竟因主事者易人拒予補助，而告胎死腹中。「任何文字語言隨時代與生活環境的變遷而不斷在演變之中，任何辭書、字典，都永嫌「過時」，因為語言是生生不息地在發展演變之中」(引自何懷碩「論中文現代化」六六、五、二六中央副刊)。一九七二年日本西藏佛教研究會曾將一九五九年出版之格西曲札的「藏文辭點」影印再版發行，一九七三年藏人董托(T. G. Dhong thog)也在印度達蘭薩拉出版了一本「最新簡明英藏字典」(The New Light 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加上本文所介紹的兩部藏英字典的先後出版，而我們却繳了白卷，豈能不為之汗顏？為了加強對海外藏胞報導國內進步實況，為了闡揚三民主義，筆者深感有關的藏文譯名有統一編定的必要，因此重編一部完備的藏文辭典是邊政當務之急。

蒙藏委員會崔垂言先生接掌以來，鑒於邊疆研究的重要並為提高學術研究風氣，積極擴充蒙藏圖書資料，在該會成立了蒙藏資料中心，供研究者隨時參閱，並與政大合作舉行了兩次邊政問題座談會，加強蒙藏資料的蒐集、交換與運用。崔氏以學者從政而有此高瞻遠矚的氣魄確令人欽佩，我們深望在崔委員長的大力推動下能集合國內專家與藏胞飽學之士，編纂出一部最完整而精確的藏文辭典，嘉惠學子，以宏邊政，願馨香禱祝並樂觀其成。

胡格金台

瑯璁、呼倫貝爾、呼蘭、布特哈、通肯等副都統。光緒三十三年裁置黑龍江巡撫改行省制。民國設民政長改巡安使，後改省長。全省分道四，即瑯璁道、

綏蘭道、龍江道、呼倫貝爾道。縣二十有四，設治地方十。

其疆域東至黑龍江松花江會口，一千二百二十里吉林界。南至茂興站南四百十五里，內蒙古郭爾羅斯後旗界。西至哈爾濱河五百八十五里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界。北至外興安嶺吉魯河源一千六百六十里西伯利亞界。東南至布拉克臺南松花江吉林界。東北至外興安嶺西林穆迪河源一千八百四十五里西伯利亞界。西南至嫩江與雅爾河會口一百有五十里，內蒙古扎賚特旗界。西北至額爾古納河與黑龍江會口，一千有二十里右岸西伯利亞界至安巴格爾必齊河與黑龍江會一千有五百二十里西伯利亞界。

山川外則外興安嶺，內則內興安嶺。內興安嶺東西長二千四百五十里。南北寬一二百里至三四百里不等。在東者為庫穆爾山，別曰東興安嶺。西為興安嶺，別曰西興安嶺。在上者為伊勒呼里山別曰大興安嶺。東南為布倫山，別曰小興安嶺。其脈由西南而東北，復折而東南，抵松花江黑龍江會流處，伏行松花江底而南與吉林長白山脈相銜接。諸水以黑龍江為大，其在西興安嶺以東，東興安嶺以西發源之水悉入嫩江。西興安嶺以西之水悉入額爾古納河。東興安嶺以東之水悉入黑龍江。小興安嶺以南之水悉入松花江。凡諸水均注黑龍江以東入於海。曾以大興安嶺以北、東興安嶺以東，劃為黑河道，實居黑龍江右岸。東興安嶺以西之下段及小興安嶺全部為綏蘭道，居松花江之北。大興安嶺以南、東興安嶺以西，西興安嶺以東，為龍江道、嫩江貫注於中。西興安嶺以西支脈最多，則為呼倫貝爾道，居額爾古納河左岸。綜覽全境，外興安嶺拱於北，內興安嶺布於中，松花江橫於前，黑龍江、額爾古納河分別左右，居高臨下，天然形勝，一山一水，曲折平衍，皆成半環式，亦地理上一奇觀也。

黑龍江全境形勢，占東北高隅，幅員廣大，為三省冠。東臨黑龍江，北倚興安嶺，西扼俄羅斯，南控內外蒙沿邊，強敵比鄰，山河交錯，為朔方重鎮。

黑龍江之沿革之可考者自唐虞始。東南為息慎氏境，西北為山戎地。三代之肅慎、戰國之貉、漢之濊、魏晉之扶餘，後魏北齊之豆莫婁勿吉，隋唐五代之靺鞨，皆肅慎所遞變者也。而金之蒲與路，元之開元路，明之扶餘路，則又仍扶餘之舊，此皆今東南境也。三代戰國之東胡，山戎漢之東胡烏丸，匈奴左地，魏晉之烏丸鮮卑，後晉北齊之失章，唐之室韋各部、遼金之東北路各部，皆山戎所遞變者也。而元之興，都合撒兒等分地，明之脫古思帖木兒駐牧地屬之，此皆今西北境也。清興初設省，置各城，是為全境統一之始。又有謂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有大鮮卑山，即今外興安嶺，後居匈奴故地。匈奴先人，夏后氏之苗裔，實今匈奴人種，鮮卑人種所自出也。

黑龍江境內滿漢雜處，初為索倫、達呼爾、鄂倫春等族游牧地區。清初編旗制，分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皆稱旗人。有站丁為雲南戌籍。商賈初為多山西人，農戶多為冀魯人，又有回回，是皆漢人。境內以漢人為多，滿蒙及其

族次之。達呼爾人比索倫、鄂倫春較多，此外有奇勒、庫野、費雅哈、克拉、赫色、呼爾哈、卦爾察等族亦為土著，今皆漸絕或移徙西伯利亞，此皆指內興安嶺東部各族而言。至於內興安嶺以西呼倫貝爾方面，則由布特哈移往之達呼爾、索倫、舊巴爾虎，及由準葛爾、喀爾喀移來之額魯特、札薩克圖、新舊布萊亞，並由布里雅特逃來之布里雅特等族在焉。

黑龍江滿洲語稱之謂薩哈連烏拉，乃黑龍江之意，蒙古語為哈拉穆勒，亦黑龍江之意。惟漢文稱之為黑龍江，乃多一「龍」字，其因何在。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聯合報登載有關黑龍江名稱之文章，作者筆名為凌塞風，其文中一段稱：還在二百年前，有一對山東籍李姓夫婦，從煙台搭帆船經黑水洋繞過朝鮮半島，到黑龍江口的廟街，轉往黑龍江南的北大荒開墾。有一年的夏天，老李套車趕集去了，主婦在院子裡乘涼，她打了一個呵欠，就沉入睡鄉，她夢見一個陌生而英俊的大男人，把她抱上土炕……，她突然醒了。當天晚上她覺有孕了。過了十個月，生下一個黑皮膚的男孩，兩口喜不自勝。嬰兒好大的胃口，竟把母乳一吸而盡，孩子突然掙脫襁褓，破窗飛去，升到上空，變成一條嘔氣成雲的黑龍，這時天昏地暗，風狂雨急，作母親的哭得力竭聲嘶，昏厥倒地。但每天到子午二時嬰兒會突然出現在母親的懷裡啼哭索奶，吃飽後就變成黑龍飛去。老李認定是妖怪投胎轉世，一再警告其妻，決不可再餵，可是母子連心肝，仍然每天餵他兩次奶。有一天時近正午，老李捏緊菜刀躲在門後，這時候孩子出現在母親的懷裡……他剛變形，老李就一刀斬掉黑龍的鱗尾，幾乎同時地，黑龍回爪抓碎老李的腦袋，狂吟升空，妻子伏屍慟哭，當晚吊而而死。隣居的山東老鄉們把兩口的遺體合葬在一起。當天晚上閃電暴雨中，黑龍凌空而降，探爪破墳，把老李的屍體抓出來，然後騰空消失了。老李暴屍荒野，好心的鄉人們為他修墳三次之後，知道他不是黑龍之父，不可和李太太合葬在一起，遂醮資為他別營一塋。黑龍便入江中，江水也變成黑綠色了，這便是黑龍江得名的由來；這傳奇故事把這條巨流點染得更為神秘離奇，不斷的流傳。

何秋濤氏在朔方備乘良維水考曰：黑龍江古黑水也，秋濤謹案黑龍江滿洲語曰薩哈連烏喇，薩哈連謂黑、烏喇謂江也，即古漠北之黑水靺鞨，室韋所居，山海經西望幽都之山谷水出焉，郭璞注浴即黑水，蓋黑水之名始見於此。北史謂之完水，魏書謂之貌水，唐書謂之室建河，黑龍江外紀曰遼史始有黑龍江之稱，道宗本紀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龍江，前此未之見。然觀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龍門。祖州有黑龍殿陵殿並在上京並名黑龍，又似遼初即名黑龍江陵殿因為號者。黑龍江亦稱烏江，聖祖從松花江詩：源分長白波流迅，支合烏江水勢雄。又稱烏龍江，聖祖御製詩：福陵神功聖德碑，北暨嫩江烏龍江，罔不臣服。吳兆鰲長白山賦：出乎松花訖，注乎烏龍之外，蓋本諸此。至盛京通志

曰：濱瀛海以帶龍江，又曰：龍江合流而左則直可稱龍江矣。又曰：黑龍江水黑，土人亦稱黑河，松漠紀諸書謂：黑水濁之微黑是已然特據其上游或下流言，不知既受精奇里江以後，未會混同江以前，其間水色黑黃，各半分界，雖然鱗蟲出沒，恒就黑去黃，所以然者精奇里江水黃而濁也，然則世有碧黑合流不混之說不為無據，但黃碧差不同耳。

黑龍江見辭海；亦曰完水，至建河，在黑龍江省東北邊境，水色綠黑，故名，古又有烏江、黑龍江、黑水諸稱，滿語謂之薩哈連烏拉，俄語謂阿穆爾，皆為黑水之義。有二源，一出自中國蒙古肯特山麓，名曰敖嫩河，一出自西伯利亞俾功士山北，名曰因戈達河。二源向東北流至省北漠河縣西合，乃稱黑龍江。

見中文大辭典；黑色之龍，漢書郊祀志；昔文公出獵龍。墨子、貴義；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淮南子，覽冥訓；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

聖祖之御名，鐵木真及尊號成吉思

哈勒楚倫

一、御名——鐵木真

諺語云：「Luugas Luu, Baataaras sain erg」(意為龍生子，英雄有驕子)。這句名言對也速該巴塔爾(巴塔爾意為勇士、英雄)父子做比喻則為最恰當之語。據元朝秘史第五十九節載「……也速該勇士在一一五五年與塔塔兒(Tatar)部的帖木真、兀格(Temüjin üge)和豁里不花(Huribuha)等勇士交戰，將帖木真、兀格等俘虜並帶回家園。那時，詞額倫(Ogelen)兀真(uujin)正懷孕住在鄂嫩河(Onon gol)的迭里溫·孛勒答黑(Deligin Boldag)地方，就在這個時候，生了鐵木真……」。由於擒來塔塔兒的帖木真、兀格時產生，為紀念此一軍事上的大勝利，即命名其子為鐵木真。是為大可汗乳名鐵木真之由來。

元史太祖本紀亦有「父也速該，併吞諸部落，勢愈盛大，四萬帳幕(蒙古包)之主人，也速該(崩殂後在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追諡烈祖)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宣懿太后月倫(宣懿太后為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追諡)適生帝，手握凝血為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帖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彥札納西蒙古文「Yehe Yuan ulus un Mandagsan Hühe Sudar」(大元帝國發展青史)記載，烈祖獲帖木真之時刻恰逢大可汗彌月之吉期，遂命名大可汗為鐵木真，用以紀念武功盛事。這一點雖與元史記載有異，但為

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註：黑龍、水精，殺之以止雨也。

以上各資料顯示，黑水之稱古時即有之，黑龍江之稱遼時始有之。黑水者形容水色，黑龍江者形容水形(資料中所云「鱗蟲」者似接龍)。故黑與黑龍江者實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黑龍江全長四千六百餘公里，與黃河、長江齊名的巨流，無論是土壤森林草原河流山岳的大資源都在這巨大流域地帶，尤其這巨流的發源地敖嫩河是蓋世英雄成吉思汗的發祥地。但至清季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和俄國訂立(璦琿條約)，黑龍江北岸的廣大地區及江東六十四屯盡失，而江上的航行權遂成中俄兩國所共有，而失一半權矣。

筆者係黑龍江土著，「九一八」事變後，多半時間在他鄉作客，來台後又將近三十年，但願那咆哮激盪滾滾奔騰的黑水鱗波，靜待看揮戈還鄉的我們，能使我們重覩龍形雄姿。

紀念武功一節則屬相同。

樸儒頓(M. Prawdin)著蒙古帝國史言：「……是為蒙古酋長，此次的勝利對也速該巴塔爾而言，確有其值得紀念的意義，尤其是恰逢其第一個嬰兒的誕生，更何況又是男嬰，故命名為鐵木真」。

擒帖木真之時日為大可汗出生之日或為彌月之日，記載多不一致，惟依蒙古古今習尚而言，新生嬰兒之命名，須在彌月之期內行之。已無容置疑。在彌月吉期內擒獲塔塔兒部長帖木真、兀格，而名大可汗為鐵木真，以紀念其武功一節，諸史都有相同的記載，亦為不爭的史實。

蒙古習俗為紀念戰功榮譽而為子女命名之例頗多。例如：太宗窩闊台(Ogodei)有七位公子，其長公子名為「合失」(Hoshi 即海都之父)，是為太祖成吉思汗征西夏大勝而命名者。蒙古族人當時將西夏叫做「阿西」，「合失」如「河西」之音而成「Hoshi」(合失)。又語尾變化為「合申」(Hoshin)。

在蒙古族人中也有為紀念祖父之高齡而命名者。如「Jirantai」(六十壽)、「Dalantai」(七十壽)、「Nayantai」(八十壽)等是。又有因嬰兒駢指而命名為「Jurgatai」(意為駢指)者。惟以駢指而命名者，為數極少。

蒙古史料校註四種聖武親征錄校註卷一裡有「鐵木真誕生時右手握凝血」此種凝血蒙古語叫做「Nuji」而神異，以授鐵木真」之記載。在樸儒頓(M.

Pravdin著蒙古帝國史有「……其手握發血魂如紅寶石。巫師(Böge)預言，此為鐵木真將來勢必成爲一個大軍事家大英雄之預兆而有此名」。此二說確有「鐵血英雄」之意味。

又丁向賓編著成吉思汗之歌一書言：「……也速該抱著嬰兒，那孩子不會哭啼，那只小手生下來就握得緊緊的，纏着眉頭，紅胖的面孔有點發紫，在那嬰孩的手裡握着那顆亮晶晶的凝結的血塊，好像紅色寶石，也速該驚異的注視着這個奇情，他想起夜裡的景象又覺得不吉，這時候泰亦赤烏惕的首領塔兒忽台捉住了塔塔兒酋長帖木真、兀格，並立刻把俘虜送來，於是也速該就給他的兒子取名爲鐵木真，其意是「最堅強的鋼鐵」。在其註文裡又有蒙古族人常以初見之人物或初聞之事爲新生子女命名者。此說雖與歷史記載略有出入，但它敘述了大可汗誕生於夜晚時辰一事是值得吾人應予注意的記載。彥氏青史及樸儒頓氏蒙古帝國史有關大可汗生辰的敘述皆爲白天。但在秘史及元史的記載，均爲也速該勇士經過多次的激戰和廝殺，終在此一戰役中擒獲了毒害哈布勒汗之夫人及謀殺俺巴該汗之塔塔兒酋長帖木真、兀格，而非泰亦赤烏惕部的塔兒忽台所戰勝。

由於此次戰役之大勝，蒙古李兒只斤氏族勢力。於是又告抬頭。蒙古民族所以成爲全世界盡知之民族。端賴此一戰役之能獲全勝，始有以致之。也速該勇士爲紀念此一戰果，乃以敵將之名爲其初生愛子之名，實屬具有重大之意義，所可惜的是烈祖也速該雖雪洗了過去被辱之耻，但又遭致塔塔爾族人毒害身死的教訓。所以到了英明的大可汗——成吉思汗時代，特別重視用膳，遂有內膳非爲近臣篤敬素著者不得爲之之記載。實源於接二連三的極毒害事件之教訓而設。故在元朝一代有飲膳官制。秘史有「兀兒保赤」、元史有「博爾赤」及至文譯語有「約立赤」等名詞，意爲「御膳官」[Hooiachi]。而非「Boo-lachi」，如[Poolachi]則維吾爾語裡的「抓飯官」。

上面所引用的史籍如秘史及元史爲蒙古歷史之骨幹，其他幾本史書因爲秘史及元史互有出入，僅提供參考。至其他敘述相似的作品不便一一例舉。

大可汗的乳名爲塔塔兒領袖之名，故有些塔塔兒民族有大可汗爲塔塔兒族之謬說。但歷史都有詳盡的記載不再論列。

在日本明治維新後，大正年間，日本學者認成吉思汗爲源義經之說，一時轟動世界史壇，效略述其情形以供史學界參考與評釋。

日本平清盛霸業時期，即第十二世紀末葉，源賴朝及其異母兄弟源義經二人被平民軍捕擄，當時平民之繼母見其情可憐，請赦其命，平民遂將源賴朝流放於日本東部地方，而源賴朝之異母兄弟源義經雖亦獲赦免，但受命削髮爲僧。平氏此舉乃爲其母「常盤」的美色所動。并納其母爲妻。後來他亦成爲日本史上不朽的女英雄。然歷史的創造往往基於偶然的奇緣而成。嗣後被平氏赦免一死的源氏兄弟勢力漸盛，平氏與源氏之間舉兵發難，各地武士群起響應源賴

朝，平氏滅亡，威勢盡失。在平源二氏的爭霸戰役中，源義經爲無敵英雄，源賴朝忌其異母兄弟之功高，急欲去之以爲快。遂迫之逃亡。據日本史載源義經經過八年逃亡生活後終於切腹自盡。這位悲劇將軍的命運頗爲浪漫，在日本古典文字和戲劇中，他所提供的生動材料甚多，即使日本兒童，至今獲津津樂道其英雄的故事，並時掬以同情之淚。

可是小谷部全一部著「成吉思汗是源義經也」(意爲成吉思汗即是源義經)一書，當時轟動世界史壇，在日本大正十三年十一月發行初版，翌年十一月廿五日即已發行至第十版。頗有洛陽紙貴之趨勢。日本歷史學界對此書之論據之乖謬謬誕不經，遂有「成吉思汗是源義經にあらざ」(意爲成吉思汗非源義經)之書的出現，以及一些評論等的作品不下數十種之多。筆者對此書之無稽之談以及牽強附會之說詞，已有前內互等各東洋史學家爲之駁斥，不再贅言。

二、御名——鐵木真的釋義

姓名本是透過語言形式，給予每一個人的稱號，對一古人的成爲偉人與否，沒有什麼關係存在。正如烏拉底米兒遺失(Vladimirov)所著「成吉思汗」一書裡說：「此可視爲古代蒙古的一種習俗，旨在紀念武功，並無其他意義寓於其間」。就因爲元帝國擁有世界性的四大汗國，國內各研究蒙古帝國史者，對元帝國之創始人——大可汗鐵木真的御名亦有深入淺出的研究心得，其趨勢正是方興未艾。大可汗御名的釋義，見仁見智各持己見極不一致，但歸納起來大致有二。其一爲忽視了姓名爲語言形式而存在之重要性，多依據大可汗之成就及威勢予以釋義者。其二爲蒙古古典文記述裡，大可汗之御名亦有多種形式出現，以致其真實涵義反而模糊不清。這些是釋義紛歧的主要原因之所在。茲將依據幾種成吉思汗傳及其他文獻討論分析如下：

(一)文獻上的釋義

- (1)馮承鈞先生爲國內元史權威學者之一，在其所著成吉思汗傳，釋鐵木真意爲「精鐵」。
- (2)美國學者賴姆(H. Lamb)著成吉思汗傳，將鐵木真釋義爲「鋼鐵」或「精鐵」。
- (3)欽定元史語解卷十、人名「特穆」一條意爲「鐵之最精」。
- (4)張柏亭中將著成吉思汗傳言鐵木真蒙古語意爲「精鐵」。
- (5)丁向賓論著成吉思汗之歌一書說鐵木真意思是「最强的鋼」。

(二)釋義分析

洪鈞著「成吉思汗傳」裡有鐵木真意爲精鐵，與「Temürchin」(鐵匠)一詞很相近之語。元代所遺留的語料至元譯語人事門，「鐵匠」之蒙古音，漢字注音爲「忒木直」。同書珍寶門裡「鐵」字蒙古語首漢字注音爲「忒木兒」，故「忒木直」尙欠「忒木兒」之「兒」字。如作「鐵匠」釋則應爲「忒木

兒直」(Temorch)才合於蒙塔那族語言語法。

大可汗之御名「鐵木真」為塔塔兒部族領袖帖木真、兀格之名，乃因軍事勝利而紀念此一戰功遂授予其剛出生之男嬰，故此「帖木真」一名為塔塔兒語言形式的名詞無疑。可是蒙古與塔塔兒兩族語言皆屬阿爾泰語族(Altaiic family)語言，人種上亦皆屬蒙古人種(Mongoloid)。「鐵」這個名詞都叫做「Temör」，是這兄弟民族語言的「母語」。「鐵匠」詞在蒙古語裡應於「Temör」字下再加語尾詞「Chin」(意為「者」或「人」)，其合熟音為「Temorchin(N)」(鐵匠)。「Temorchin」與「Temüjin」之間偏差甚遠，倘以「Temör」(鐵)的語尾的「R」輔音消失來推想，將「Temorchin」詞發音為「Temüjin」(鐵木真)，但在蒙古及塔塔兒語裡甚難覓見輔音「R」消失之例證，實言之即洪鈞先生之「鐵木真」即「鐵匠」(Temorchin)之想法無法成立。

再據至元譯語的「鐵匠」曰「忒木直」推想，設「忒木直」即蒙古及塔塔兒語的「Temorchin」(鐵匠)，其語尾變化形式為「Temörchin」(鐵匠)，則是「Temör」(鐵)與「Chin」(者、員等)的合熟音。可是大可汗的乳名為塔塔兒領袖「帖木真、兀格」意義相同的「鐵木真」(Temüjin)，蒙漢記載皆如此，「鐵」在元代語料至元譯語珍寶門裡「鐵」曰「忒木兒」，而非「鐵木」，倘若「鐵木真」作「鐵匠」釋，則應該是「鐵木兒」，仍欠「兒」字(蒙古近代語「鐵匠」為「Darhan 達爾汗」)。同書記載，「直」、「真」在語尾形式上，均表示着「匠」字之義。但就「Chin」和「Jin」而言，在蒙古文語正統的捲舌送音是「Chi」。在地方方言：東蒙古著土語裡成為捲舌清擦音「Shi」。在喀爾喀方言裡則為「tsi」……是故「Temörchin」(鐵匠)有發音為「Temörjin」的可能，但脫落了「兒」音的問題仍無法解釋。正如前述「鐵木真」即「鐵匠」一說，不合於蒙古及塔塔兒語的語法。

據塔塔兒本族人說：「Temörchin」具有下面兩種含意：其一，「Temör」為「鐵」，「Chin」為「China」亦即「秦」，意為「中國的鐵木兒」，但當時的蒙古還未納入中國版圖，當無法成立。其二，「Temör」為「鐵」，「Chin」亦有「真實」、「純良」之涵義，與「鐵木真」釋義為「純鐵」、「精鐵」之說相脗合。按洪鈞先所謂的「名從主人」說法，那末，依塔塔兒人解釋塔塔兒語的「鐵木真」為「精鐵」，則大可汗御名「鐵木真」釋義為「精鐵」當屬可靠之說法。

近代蒙古與塔塔兒語裡「鋼鐵」為「Bolod」，東蒙語裡亦有「鋼鐵」為「Gang temör」者。筆者為適名從主人的原則，亦支持「鐵木真」釋義為「精鐵」之說法。至於原名「帖木真、兀格」之「兀格」意為帽穗，是官員始有「帽穗」，是故「兀格」者乃由帽穗轉義為高官領袖之意，故「帖木真、兀

格」即為精鐵領袖。

又「兀格」在塔塔兒語裡的發音為「Phike」，其意義與「兀格」相近，只在發音略有偏差而已。而依維吾爾語，「兀格」之意義則為「弟弟」，蒙古語裡「兀格」則意為「語言」。

三、大可汗的尊號——成吉思

(見秘史第一百二十三節，阿勒壇(Altan)、忽察兒(Huchar)、撒察別乞(Sacha behe)等共同商議後，對鐵木真說：「大家請您做可汗……」。這樣商議定盟誓，共擁立鐵木真做了可汗。這是鐵木真做可汗的開始，也就是僅僅蒙古部族為範圍的可汗，(筆者註事在一一八九年)。自從創建蒙古各氏族聯邦式的蒙古國(意為多數之中心國)並領導蒙古國婚姻結親為餌，誘捕哈布勒汗之繼承人俺巴該(Ambagal)汗，並將其轉送至素有世仇的金朝，旋即被釘死於木驢，嗣後蒙古國勢遂一蹶不振，而此次鐵木真被擁戴為蒙古可汗，却是蒙古勢力再度抬頭的開始。

秘史第一百零三節載：平定了所有黠帳部落(Ise Gein Tugurgatu)百姓，於是虎兒年(丙寅一二〇六)鐵木真在鄂嫩河(Onon gol)源頭，召集庫里爾台大會，樹立九腳白纛旄(Isün hütü chagan tug)並共上鐵木真的尊號為「成吉思」(Chingis)……。依據此一記載，則「成吉思」之尊號無可置疑的是經由大庫里爾台議決後所授與之尊號。

依據其他蒙古文古籍如彥札納西著大元帝國發展青史、薩岡斯欽(Sagan Sechin)著蒙古源流及「Erdeni in erhe」(珍寶史綱)四種手抄本，以及羅布桑丹金(Lobsang danjin)著「Bolor ering」(水晶念金史綱)、拉西彭蘇克(Rashipongsuel)著「Bolor ering」(水晶念珠)等史書記載，異口同聲的都說是：當鐵木真登基於鄂嫩河畔時，有一隻「五色奇鳥」飛翔於天空而叫聲像「Chingis」(成吉思)，又說此「奇鳥」落在屋頂上其鳴聲像「Chingis」(成吉思)，亦有謂此鳥為「黑黃色」即「褐色靈鳥」之說。惟彥氏的青史却指名為「Garudi」(意為鳳凰)。這三種不同形式的「鳥」和「成吉思」尊號兩種不同的來源，有些史學家認為以神話釋之。筆者以語言學的立場觀之，則認為：假設是神話亦有其神話的高度價值存在。

據前述各種史籍所載，此一尊號之來源，乃由大庫里爾台授與及因「奇鳥鳴聲」而有者，實為「一而二」之問題，設真如「奇鳥鳴聲」像「Chingis」而有，亦經過大會討論而決議其取捨。是故筆者認為「成吉思」此一尊號為經過大會決定共上之尊號，其與奇鳥鳴聲並無相抵觸之處。

秘史及其他史籍裡未述明「成吉思」如何義之詞。只是像無字天書勿須解

其深奧寓意亦未言明其涵義，是故「御名」「尊號」成為史學家所探討之焦點，迄今方興未艾。

又依彥札納西等史學家之鉅著而言，蒙古地區，在古代遠比近代地大人稀，到處天然森林，高山險崖，一望無際的草原與沙漠，綠洲與湖泊可謂是星羅棋佈，河川縱橫長流不息。「奇鳥」與「鳳凰」在古代也許真有過，亦未可知。但吾人絕不能漠視其記載，亦無法斷言其為非。在秘史第廿五、廿六節及元史(一)與馬哥博羅行紀等書籍裡，都有有關馴鷹的故事之記載。在蒙古社會裡時至近代仍有飼養猛禽(如鷹等)捕捉飛禽走獸之事實。在近代蒙古定居的社會習慣裡，其所種植的樹林裡如無飛禽棲居時，有不祥之兆的觀念，在遊牧社會裡(Shagajagai)及烏鴉(Hong heree)落於蒙古包頂上鳴叫，則不獨是不討厭，反以為是報喜事而高興。在這種社會裡「奇鳥來鳴」雖為神話，但也有其反映社會真情的高度價值存在。例如科學家為昌明的社會與國家裡，還不是重視著希臘和羅馬的太陽神(Apollo)乎？西方國家如此，東方的日本亦復如此，如日本神武即位天皇之前紀，金色靈鷲飛來止於皇司耳，其瑞光輝煌狀如電流。由是敵長髓彥軍卒皆迷目不復力戰大敗之歷史紀載，日皇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年)以此為其皇族之榮耀而創定金鷲勳章，其陸海空三軍中武功卓越之將士，莫不以此勳章而引以為一生之榮耀乎？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紀念歌亦以「金鷲輝煌的日本」一語開始，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的思想、語言都是其社會的產物，神話當亦不例外，其與社會的真實性自有其不可分的關係存在。這種神話一代又一代的相傳迄今，雖不盡有歷史的紀事，但吾人絕不能因崇尚科學精神而否定現有文化，使其湮沒無跡，此世此代以科學不能解決的事物尚多矣。

(一)「成吉思」一詞，不問其為「奇鳥」傳音的天語或經大庫里爾台討論通過共上的尊號，總是有神聖的釋義，為此，國內各學者曾對此詞之奧義，下了些不平凡的研究工夫，可是此「成吉思」一詞畢竟屬何義之詞，迄今學術界是見仁見智各持己見與論據，極不一致，吾人在本文裡，依據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一一討論分析，並將個人的淺見述說於後，以供方家參考。

(1)法國神父、蒙古史學者伯希和(P. Pelliot)教授的解釋最為特殊。伯希和教授以蒙古語言文化為據，用比較語言學的法則解釋了「成吉思」之涵義，此亦為近代學術界大多數學者所採用的釋義。他說「Chinggis」(成吉思)一詞為蒙古語的「Tenggis」(意為巨澤)之音變而成。「Chinggis」意即「大海」。元朝定宗貴由(或貴余克Gürük)可汗，致羅馬教皇書中曾自稱「Dalai Haan」(意為海洋可汗)。

(2)伊兒汗國(ILR HAANT ULUS)的猶太籍宰相失德烏丁著蒙古史全集「Chawel-i Tevarikh」)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之部族

篇裡言，奧古斯(Oguz)族集團為全蒙古與突厥族系的源頭，奧古斯六位兄弟分為日、月、星、空、山及海以主宰宇宙空間，再由彼等六兄弟各分成四種親族集團，成為二十四個分族。參見下面「族靈」表。

奧古斯六兄弟親構成表

翼別	次序	始祖名	族靈	應共食肉的部分
右	1	日可汗 (QUN HAN)	白鷹 (CHAGAN ELEE)	最先的肩肉(右方的)
翼	2	月可汗 (AI HAN)	鸞鷹 (BÜRGÜD)	最後的肩肉(腰肉)(右方肩肉)
翼	3	星可汗 (YULDUZ HAN)	TAUSHAN JIL (鸞之一種)	最初的前肉(右方脇肉)
右	4	天空可汗 (HÖH HAN)	SHONGHOR (鸞之一種)	左方脇肉
翼	5	山可汗 (TAG HAN)	不明 (鸞之一種?)	(最初的前肉?) (右方腰肉)
翼	6	海可汗 (DENGIZ HAN)	CHAQIR (小鷹之一種)	腰肉(?) (右方腰肉)

註1 此表全文取自日本村上治二先生之《東洋史研究》。

註2 蒙古民間薩教(Shamanism)的巫師(Böô)做法時呼喚白鷹蒙古語叫做「Chagan Elee」。

註3 蒙古民間純牧及半農半牧社會裡分肉有一定的分量和分配等級，吃羊肉亦有左右之分別，與此文的左右方之分稱頗有關係。

註4 第三格的「Taushanjil」在維吾爾語裡為「鬼年」，此「Taushanjil」一詞，如讀為「Taus-Han」則在維吾爾語及蒙古語裡有「孔雀可汗」之意。又如「Taushanjil」為「Taushan Yile」或「Elee」則有「鬼鷹」之意。筆者認為「Jil」字有誤，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註5 第五格族靈欄原文為「不明」，其下應註明「鷹的一種」字樣。在蒙古與亞洲肉食猛禽有「Büre Güp」(鷹)，「Hirgul」(鵠)及「

Harchagai」(獵鷹)都有當作「Onggon」的「能性之猛禽類」，後者亦為巫師做法時常呼喚的鳥名。

註6 第六格族靈欄的「Chagir」在蒙古語裡叫做「Chagir Būrgūd」，是有斑點的「鵬鳥」，及今蒙古地方尚有此鳥的存在。

註7 第六格始祖名稱欄的「Dengiz Han」(海洋可汗)與「成吉思汗」尊號音韻上為很接近之詞。難性伯希和先生有將「成吉思」釋義為「巨潭」之高註。

(3)洪鈞撰元史譯文證補卷一載：「……「成吉思」的「成」「大」也，「古思」「最大」也……」。同書卷一下、頁五十三有言：「西域人，志費尼之君則云：昔時有濶濶出(Högeju，筆者註：日本蒙古史學家那珂通世博士言，濶濶出意為巫神)，其人似有先知，令合極寒時，裸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夫語，將神『鐵木真』以天下其稱號為「Chinggis」，別無解釋……」。

又見於洪鈞漢譯多桑蒙古史上冊頁一說：「『成吉思』為「強壯」、「堅強」之釋義……」。

再見於洪鈞著成吉思汗傳言：「晃豁壇(Hangtan)部人力古克之子濶濶出(Högechi)為薩門(Shaman)話神曰：「昔者具有古兒汗(Golhan)事神註：Gol Haan 意為中心可汗」尊號之數主皆已敗亡。效奉天命詔「鐵木真」為「成吉思汗」，群臣遂上「鐵木真」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之義或謂「剛強」或謂「田吉思」(Tengiz 或 Dengiz)之音轉。猶言「海洋」，與蒙古語之答來(Dalai)為同義也。濶濶出別號，帖卜騰格里(Tap-Tengri 筆者註：蒙古喇嘛教所言有卅三種天。薩滿教為七層天皆為單數，此為其中之一名)猶言天像詔蒙古人謂常乘馬至天上，蒙古諸部頗尊崇之」。

在洪鈞漢譯多桑蒙古史裡亦明言，首先提倡「成吉思」為「強壯」、「堅強」之釋義者為刺失德烏丁，後來屠寄與洪鈞兩位蒙古史家始引用此釋義。屠寄撰蒙古史之記載同，故省略之。

(4)法國蒙古史家格魯賽著蒙古史略，洪鈞漢譯本裡說，有人說「Cingiz」(成吉思)為「Cinga」(強盛)一字之中「成吉思」一字之原意。又見於該史略漢譯本卷一頁十載：「一〇〇六年陰曆十二月，在鄂爾河源頭始開大「庫里爾台」，由大會推戴鐵木真為一切蒙古、突厥諸部族之「成吉思汗」，質言之即推戴鐵木真為「宇宙可汗」。

(5)政治大學教授馬明道先生說，「成吉思」為「突厥」語的「Ching GZ」意為「青色日精」，「青」為漢語的「青或灰色」，「高亦子」(G

Z)為突厥語「日精」。這種說法適於「灰色日精」，但須證明突厥語裡確曾借用漢語的「青或灰」始能成立，「Ching GZ」(灰色日精)一詞也才能證明其為漢突協和語。突厥語裡有否借用漢語之借用語，待考。

(6)元代遺留的獨一無二的純語料至元譯語(一三三四年)的作品)其走獸門裡「龍」這個名詞之蒙古音，漢字注音為「騰急赤」。天文門裡「天」這個名詞之蒙古音漢字注音為「騰急里」，「天」在蒙古語為「Tenger」或「Tengri」，文語正統書寫法為「Tegri」是為大家所既知的事實。至於「龍」的元代發音為「Tenggechi」，或「Tenggechi」語詞與「Chingis」語音和義都很接近，如以濶濶出之理論為據，「Chingis」即可明「Tenggechi」(龍)釋之。

(宋孟珙撰蒙鞬備錄裡言：「成吉思」者意「天賜」……。

(三)筆者管見與分析：

蒙古語言和其他語言一樣有其古今之別。方言音之偏差，只不過是其方言差別比漢語之方言差別較少而已。茲依據上面的記載，分析「成吉思」一語之音質及其應有之涵義如下：

伊兒汗國之宰相刺施德烏丁(Rashid eldin)所撰蒙古史全集為西方研究蒙古史學之源泉，其人為波斯(Persia)在九三五年更名為Ceran)之哈島丹人，生於一四七年，其高著蒙古史全集僅次於蒙古秘史及元史，其部族篇與古思六兄弟裡老公為「Dengiz haan」(海洋可汗)，「Dengiz」與「Chingis」只有元音「E」和「I」輔音「D」和「CH」及「S」和「Z」之差別，是為十分接近之詞。刺施德這位史學家為何將「成吉思汗」釋義為「最強壯之可汗」？蒙古古今語裡「Deng」跟「Ching」[Chang]之詞皆以「強壯」釋之，故此已證明「成吉思」非「海洋」釋之。此為「成吉思」非「海洋」釋之因。

據古今辭典及語彙「Tenggis」(騰吉思)一語皆以「巨潭」釋之。據元代至元譯語地理門裡「海」曰「苔來」，明代華夷譯語裡「海」曰「苔來」，盧龍塞略卷十九「海」曰「苔來」，登壇必究譯語「海」曰「苔來」，武備志譯語裡「海」曰「克答賴」(意為大海)。清代張穆著蒙古遊牧記卷十五言：「……南有騰吉思湖(今之裏海)額濟勒河(今之窩瓦河)等，俱向南流，歸入騰吉思湖，此「騰吉思」即「Tenggis」(巨潭)非「苔來」(Dalai，海)。又見於姚明輝編著蒙古志卷一有內蒙古蘇尼特之酋長騰吉思叛，率此部撤漠投喀爾喀部之記載，此「騰吉思」即以「Tenggis」(巨潭)為名者。設成吉思汗尊號為「Tenggis」，則蘇尼特部酋長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直系圖鹿博羅特之後裔，在王公府皆有家譜可循，況成吉思汗非一般的可汗，其後裔當無授祖先之名為其子之名者，更有違蒙古族人尊崇敬祖之習俗。此為「

成吉思汗」尊號非「海洋」譯之因。

伯希和 (P. Piliot) 教授以爲「Chingiz」或就是 Tengiz (畏兀兒語) 或 Dengiz (Osmanli 語) 之類音化的，其意猶言「海洋」，與蒙古語的「Dalai」語意相同。蒙古語裡的「Deng」、「Chang」及「Chingga」三詞都是「強壯、康泰」加語尾「IS」，則爲「Denggis」、「Changga」及「Chinggas」，以相同元音同化原則而成爲「Chinggis」(成吉思) 以畏兀兒語釋則是海乎，與蒙古語的語意相左，並且在蒙古語裡有以「汗澤」爲釋之「Tenghis」。

又如伯希和先生言：「元朝定宗貴由可汗(一二四六—一二四八)效羅馬教皇伊諾森特 (Innocent) 第四的國書中稱銜爲「Dalai Haan」(意爲海洋可汗)，此爲沿用先王之尊號「Chinggis」(成吉思) 而有……」。惟據元代蒙古可汗御名，自從太祖成吉思汗開始到惠宗妥懽帖睦爾共十四位可汗，(不包括北元) 其中只有太宗窩闊台、定宗貴由及憲宗蒙哥等三位可汗未見有尊號，以筆者管見，定宗的「Dalai Haan」(達賴汗) 之名銜即其本人的尊號，否則爲何世祖忽必烈不用先王之尊號而有斯欽尊號。又成宗帖木兒爲何不用先王之尊號斯欽而用完澤篤爲其尊號，是故，「成吉思汗」非以「海洋可汗」釋之，海洋可汗亦非先王之御號，而是貴由可汗本人的御號。

再如美國學人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William M. Austri 等人著「A Mongol Reader」Washington D. C. 一九六六新蒙文作品中有蒙古各汗事略。在一二四六年羅馬教皇派遣佛朗西斯派 (Franciscans) 的勃萊奴略皮尼 (Piano Carpini) 及其從者來喀喇和林，他們幾位宗教特使回國時，貴由可汗的回信上的印文爲「天上有天主，地上有貴由可汗，奉天之命，當人類之大可汗」之記載。

伯希和先生之「Tenggis」(巨澤、海) 首便爲「Changgis」一說，蒙古語裡確有此現象，例如東部方言區喀喇沁土語裡蒙古文語的正統音「Teimu」，「Tengged」及「Tengbul」等語的輔音「T」首便爲「Ch」，則有「Cheimu」(是那樣的)，「Chingod」(是那樣的後) 及「Chingbul」(是那樣的語) 等現象。

「Chingga」(強壯) 一詞首變爲帶音的「D」及元音「i」首便爲「E」而有「Deng」，這在一般會話裡此語常出現，爲「Beichin deng Bainu」(意爲貴體健康否)，根據以上的史實及語言現象，吾人瞭解到「海洋可汗」爲貴由可汗之個人尊號，定宗則爲其諡號。

由於刺施德之釋義，洪鈞的譯文裡亦提到馮、屠二公引用刺施德氏的釋義者，因不諳蒙古語文，受隔行如隔山之隔閡，將首節語切錯而成爲蒙古人不明

其義，漢人亦莫明其究竟之「甲骨文」，大家只是見仁見智的去猜想或推測，故迄今仍十分紛歧是爲主要原因。其實馮屠二公所引用者乃爲最正確的釋義。

在學術界有一種不成文的習慣法則，在年代上刺施德之蒙古史全集比伯希和神父之考釋早五百年之多，尤其是刺施德其人在一五八八年被誅死之前的參考資料，皆以皇室的秘密紀錄等第一手史料爲依據，並非憑空捏造，可以說是其來有自，並不是經攷釋而後所作的釋義。

③成吉思汗爲最強壯可汗之證言：

以古典蒙文 (Classical Mongolian) 爲據分析討論如下：

在古典蒙文裡古根聲母「G」與喉塞音「H」爲一字母而發「G」跟「H」之二音。以漢字習慣言，則爲破音字，是故「Chinggis」(成吉思) 也就有了兩種發音，即「Chinggis」跟「Chinghis」。文字是無形語言的有形符號，而有形符號的文字發爲無形之語言，也要依據語音之習慣性，如「重慶」的「重」發音如「重量」的「重」而爲「重慶」，看病的「大夫」如發爲士大夫的「大夫」是成爲何語，同樣道理，依據蒙古標準語則「成吉思」是「Chinggis」而非「Chinghis」。

在蒙古語裡，尤其是在東部方言區裡，鼻音「NG」之後疊有喉塞音「G」時，居後者音便爲鼻音化的「G」。例如：

蒙古文語正統的：

1 「Monggol」(蒙古) 變「Mongol」或「Moᡑol」。

2 「Mingga」(十) 變「Min-g」或「Min」。

3 「Chingga」(強壯) 變「tʰiq-k」或「ten」或「tʰaŋk-tʰaŋ」

「ten」及「tʰaŋ」四種發音，在語尾的喉塞音「G」消失的音爲東部方言音，語尾有喉塞音者爲中部方言音，但互相通達無阻。

「Chingga」(強壯) 在語尾加表示多數的「S」時，語尾的元音「A」以元音的順行同化原則成爲「Chinggis」(表示著最強壯的可汗)，在一般性的蒙古人之發音多爲元音「i」跟「A」之間的音「e」，則如「Chingges」，因爲元音「i」爲中間性，元音「e」雖屬陰性化，與蒙古語的元音和諧 (Vocallic harmony) 並無抵觸。

在近代語裡最強壯的表達方式，均不用此專用名詞，而用比較級的「AA S」，如「Chinggaas Chingga」(最強壯) 的形式表達之。依其他在語尾加「S」表示最高級最強壯的語詞，則有下面的專用名詞：

1 「Hümnü」(一人) —— 「Hümnüs」(多數人)，近代口語裡「M」消失而爲「Hünn」(人)。

2 「Luu」(龍) —— 「Luus」(龍王)。

「Shimnu (魔鬼)——Shimnuis (魔王)。
Sholmo」(強壯)——「Chinggis」(最強壯)。
如上述，依據刺施德的釋義「成吉思汗」為「最強壯可汗」之說來分析

俄帝赤化下的外蒙古

VICTOR P. PETROV 著

林佩音譯

根據比較正確的統計，到一九七〇年元月底為止外蒙古的人口總數是一、二七七、八〇〇人，其中約有百分之九十是蒙古人。如果要說蒙古是多種民族的國家並非事實，位於中亞達車小徑十字路口之亞洲心臟地帶的外蒙古，若千世紀以來一直被目為移動民族的匯集之處，結果使其成為一個混合性的民族和國家。

在外蒙古地區，至少可以區分為十二種組合並使用不同的語言。阿爾泰系語言是其中主要語言的一種，在此語系之下又分三個重要語系，那就是蒙古語、土耳其語和通古斯（滿州）語。全部人口之中約有百分之九十屬於蒙古語集團，此一集團下可分為好幾個族，喀爾喀蒙古（Khalika）是其中一支最大族系，佔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七十五點六。這一支族系的人多聚居於杭愛地區（Khangai Region），但是從東部邊境到蒙古阿爾泰山脈的若干重要地點也有這一族系人定居生活，他們都保持着固有傳統、語言和習慣，從未稍加改變。在外蒙古西部地區由另外一個蒙古語系的集團人——額爾特（Oirats）所佔據，他們在總人口中數量較少，約佔百分之七強，其語言則與喀爾喀蒙古人截然不同，他們是使用蒙古文而又用土耳其語的一種混合語文。

土耳其語系的群體以克薩克人和土文人（Kazaks and Tuvinians）為代表。在總人口之中佔百分之四點三的克薩克人居住於全境最西部地區，有一個單獨的變馬克來管理行政工作。至於圖汗人的人數更少，祇佔總人口中的百分之一點九而已，他們主要聚居於科布多山谷（Kobdo Valley）一帶地區。

第三種也是最小的阿爾泰語系集團，那就是通古斯（滿州）人，這一語系集團的最主要是居住在蒙古的東北部地區。

蒙古人之中有些是能說中文和俄文的。中國人於十七世紀末葉開始進入蒙古建立農業示範區，這個地區就是現在的色楞格和中央愛馬克。俄國人大約在十八世紀才到達蒙古，較中國人遲來了一步，他們在總人口中約佔百分之一，其來源大多是西伯利亞的難民或是從西伯利亞囚犯隔離區逃出來的，這些人差不多都是沿着色楞格和幹難河流域居住。

，合於蒙古語言的演進及語法，更適於當年「鐵木真」具有最強壯的體力及健全的毅力始能勝過那些英勇武士的歷史史蹟與俗語所謂的「Chihirag Beiyed, Chingga Jorig」（意為健全的身體始有健強的意志）。

多少世紀以來，蒙古人都是過着游牧的牧人生活，他們常常的移動以便為家畜尋找草原和充足的水源，這些牧民每一季節還有其特別繁複的工作。當春天來臨時，牧人們及其牲口群通常都到了南方的山林坡地，以躲避寒冷的北風。在和暖的夏日季節他們又帶着牛羊走向河流或山林，因為這些地方才有綠草和飲水。五六月間是綿羊的剪毛期，母牛產犢完畢牛奶也開始生產了，六月底母馬開始產奶並準備將其製造發酵，到了九月又為綿羊作第二次的剪毛工作。外蒙的秋天一般總是提早來臨的，到此時期牧人們率領家畜又走向新的環境，而這些環境是比較有風的地方，因為風可以驅散成群結隊前來攻擊家畜的小昆蟲。當冬季來臨時，牧人們又將牛馬羊群移向避風的山谷以防止冬風的吹襲。一般的方法是用粗糙的木料搭起建築物，四週圍以石牆加上一部份屋頂，這是一年中最唯一為家畜準備遮蔽物的時間。當每年大地春回之時又移向南方的山坡地，如此週而復始循環不已。

外蒙自從實施農業集體化以後，家畜的飼養制度已有若干改變，但多數情況是家畜繼續為自己找尋草料，牧人仍然過着其祖先的游牧生活，不過，牧人如已參加農業合作社為社員，或是家畜的所有權人而這些家畜大多數又是公有的話，則將受到相當的約束。

現在蒙古人的臉型已經有或多或少的改變，都市人口的成長是造成臉型改變的主要原因。外蒙古在「獨立」以前，總人口之中僅有百分之二可被區分為都市的人，他們主要是外國人、代表團的官員、領事館內的外籍人員以及貿易公司的職員等。但自從「獨立」以後，都市人口與鄉村人口在比例方面日漸上升。一九二七年時期外蒙的城市居民祇有百分之十三，十三年以後升高到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到一九六七年顯示總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點四都居住在城市之中。

據估計大約有三分之二的都市居民都集結在「首都」所在地的烏蘭巴托，也就是說佔了全民之中四分之一的人數——約二十七萬人。其餘的都市居民則分佈於其他各地，主要是在過去幾十年來所定居的變馬克中心地區及工業城市，例如：蘇赫巴特、喬巴山、科布多、納來卡煤礦工業中心的納來卡（Zalai-）

kha)、石油工業中心的宗伯恩(Dzunbayan)、戈壁沙漠的塞香達(Sayn Shanda)、北部新綜合工業中心的達克漢(Darkhan, 該地現有居民四萬人以上。)等處均有這些人居住其間。

蒙古人雖然是傳統的遊牧民族,不過他們對城市的建築也有相當歷史,第一座著名的蒙古城市建於紀元後的第七世紀,那是維吉爾政府的統治時代。11110年卡勒崑崙市(City of Karakorum)興建於奧克洪河(Orkhon River)的堤岸之上,作為成吉思汗帝國及其繼承者們的燦爛首都,一直到中國的明朝軍隊佔領蒙古以後才趨於沒落。許多現在城市如烏蘭巴托和喬巴山等,好幾百年來都是僧院所在地,也是文教中心處所。至於邊境地區的城市如烏勒蘇台(Ulyassutai)和科布多(Kobdo)通常都是環繞堡壘或砲台地區發展而成。

就外蒙的房屋而言,可以反映出其為傳統和現代的混合物。在遊牧生活中需要的是一種特殊型式的遮蔽物,那就是易於摺疊然後放置駱駝背上或其他動物背上載運的帳篷,一般稱之為「蒙古包」。自從實施農業合作社以後,生活方式雖已諸多改變,但是蒙古包在鄉村中仍然被大眾所採用。這種帳篷式的蒙古包從搭建到完成約需三十分鐘,其組合之情形為:用四到六根木頭方格鑲板置於地上形成圓形並以木條連接頂端,在此最高頂處有一圓錐形的開口處,作為帳篷裏面爐灶冒煙之用。骨架之上覆以一層毛氈,其中再漆以白色且有繩索相連接。一座典型的蒙古包在其室內中央必有一架開口的壁爐,其燃料在早期的遊牧草原上是用牛馬的乾糞便。蒙古包進口處的正對面是一張神桌,一般都是用一只高的木箱,箱子上面放置神像及其他供品。

有很多老一輩的牧人,在嚴冬的夜晚寧可擁擠在蒙古包中取暖。當夕陽西下後,帳篷內會突然變得熱鬧起來,其原因除了家人及來客以外,並且還有小牛、小羊、小犏牛甚至連姪娘中的綿羊都光臨了。由於燃燒着的火爐使屋內業已相當舒適,而室內一半人類和一半家畜的呼吸與體溫更是增添了溫暖氣氛。在此舒適而溫暖的夜晚中,其一般習俗是人人睡在衣服或獸皮之上,不過當強烈寒風透過毛氈接縫處的空隙鑽進帳篷使人感到不舒服時,皮衣常被用來蓋在身體上。

蒙古包在農業合作社中,一座接着一座是用木材或磚頭建造,蓬頂以鐵片鋪成。在更遠的北部西伯利亞邊境地區,蒙古人的房舍與蘇俄鄉村的木頭屋頂房屋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形式。在城市和鄉鎮中,對日漸增加的農工人員而言,公寓是較為便利的住所。外蒙於第一期五年計劃中祇興建了三百四十棟公寓;第二期五年計劃中却興建了兩千棟,兩者相加已超過一萬一千兩百萬方公尺供給城市居民作為社區。與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之間比較,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的生活空間。以上這些公寓之建設,幾乎全部是依賴其他共產國家所援助。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蘇俄曾在烏蘭巴托建築了四千三百萬方公尺的公寓。

時中共與外蒙尚在友好階段,所以也在烏蘭巴托建造約五千四百萬方公尺的房屋。另外捷克則幫助外蒙設計現代房屋建築的計劃。

牛羊等家畜為蒙古人之主要食品,故蒙人多以肉類及乳類作為飲食,向時也消耗大量的茶,蒙古人能製茶,茶的功用在蒙古已經是食品重於飲料了。蒙古人的茶是將中國綠茶再製後加入大量的鮮奶、鹽和乳酪,有時還加添一些羊羔。由於其用鹽代糖,所以成了一种混合味道的茶湯而不是一般的茶水。

蒙古人家招待客人的程序是先行奉茶,接着是請吃烤羊肉,羊肉切成大片,味道與西方國家所做不同,因為蒙古羊肉之中是要用一點鹽的。肉吃完後有一道湯,最後則飲用馬奶釀製而成的乳酒,這是蒙古人最著名的飲料。

外蒙古的國定服裝名叫帶禮(Deli),很像中國長袍的形狀,它是從左到右摺疊而成再用一條長布帶加以繫牢,並且在腰部圍繞幾圈。平時穿用的帶禮是普通棉織品,但在假期節日則用綢緞製的帶禮,冬天另以厚毛料織成並配上羊皮襯裡。蒙古人的靴子底厚而鞋尖上翹,一般城市居民對歐洲式的服裝甚感興趣,所以很少有人在烏蘭巴托會發現有蒙古的靴子。

外蒙古的一般家庭都不大,根據一九一八年的戶口調查統計,蒙古全境人口約五十萬人以上分別居住於十二萬五千座蒙古包之中,平均每一家庭約有四個人強。嬰兒死亡率是造成一般家庭平均人口不多的原因之一,其兒童病症以腸胃病居多,特別是腹瀉和痢疾為造成死亡最主要之因素,至於眼疾和皮膚病也是很普遍的流行。

危害蒙古人的健康因而成病,過去似與居住環境骯髒不潔有關。蒙古的牧人對水至為厭惡,以至終身不願洗澡,典型蒙古包內的盤碟之類是不予洗濯的。一般人的衣服極為簡單,簡單到男女的服裝不但有同樣的粗糙花紋,而且布類質料也是一樣,他們穿着襯衫和鬆垂如袋子一樣的長褲,外面的長袍則拖到腳踝,衣袖常超過手指六至八寸,在冬季則穿厚重的羊皮襖,頭戴暖和的尖頂皮帽,腳上穿軟毛襪和軟皮軟底的靴子以保護足部,衣服通常是用到破爛為止。

在幾乎全部都是牧民的日子裏,外蒙的成人中由於終日騎馬的緣故,所以多患痔瘡,胃癌致死的情形相當普遍,其他的胃病多與飲食有關,因為蒙古人的飲食是缺乏變化的。事實上唯有在夏季日子裏才有一些變化,夏日生產牛奶,食品多賴以供應,而冬日缺乏牛奶,蒙古人祇有食肉,通常是每天吃一次,其中以羊肉居多,偶然也吃馬肉、駱駝肉或其他家畜的肉,因病死亡的獸肉也被食用,魚和家禽在蒙古是認為不清潔的食物。在此情況之下,「革命」以前的高度死亡率應是不足為奇之事了。「革命」以後人民生活水準頗有改善,顯示在最近幾十年中外蒙民眾已經得到保健方面的服務。五十年前保健工作多由喇嘛執行,而醫療則依賴迷信,到一九二四年為止,外蒙地區沒有醫院也沒有醫生,其後第一批蘇俄醫療隊人員應外蒙行政當局之邀進入外蒙,到一九四〇年外蒙全境終於成立了十七座醫院和一百五十個保健單位。一所專門訓練醫療

人員的學校是在一九三一年成立的，而外蒙國立大學醫學院學生於一九四七年以前畢業，從此以後，有關醫生、護士、醫師助理、醫院、病床等都逐漸增加起來。一九六八年畢業了五百個醫學院學生，當時曾考慮派遣醫生和助理到農村地區去服務，這些地區從前是難以獲得醫藥照顧的。每一個愛馬克至少有一家醫院，每一座農業合作社或國有農場有一所保健單位由醫生一人擔任服務或給予醫藥補助。瘟疫、天花以及其他傳染病以往每年都攫取了幾千人的生命，現在這些疾病業已大量減少，兒童的死亡率也逐漸減低，一九六一年的兒童死亡數目祇有一九五八年的七分之一。

在教育方面同樣地也有所改進。當外蒙古於一九二一年宣佈「獨立」時，絕大多數的民衆都不識字，正規教育實際上並不存在。二十世紀初葉時期外蒙全境祇有一所非宗教的學校，而且設在首都所在地僅能為一小部份人服務。主要的教育設備是在寺廟之中，他們專門研讀宗教方面的書籍，初步是用西藏語言。

外蒙的學校數目到一九六三年已經增加到五百所，較一九二四年增加了三十五倍以上，這是根據「獨立」後三年所公布的數目作比較。到一九六〇年末期，外蒙的初級學校、高等學校和夜校共有六百所以上，其中夜校為一百零四所負責普通教育。進入上述各種學校就讀的人數約二十四萬八千人以上。為了面對這種疾速發展的情勢，所以於一九五五年引進了兩部制的教學，同時全民的初級學校強迫教育與烏蘭巴托地區的兒童七年制教育皆獲得實施。至於成年人的文盲也能有機會到特別夜校去認字唸書。雖然大多數兒童進入初級學校後絕難完成其高等學校教育，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凡由高等學校畢業的人幾乎百分之百在五十年前都是文盲。最近統計顯示，在一千名蒙古人之中有六十六人是完成高等教育或專科教育的。

外蒙文盲之所以能夠減少，應歸功於一九四五年蒙文字母的全面改革及啓用新的字母，因而獲得迅速而令人驚訝的效果。一九四〇年全蒙古人口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自從改用此種新的蒙文字母五年以後，文盲人數已減到百分之三十五，目前文盲幾乎業已絕跡，祇有極少數年老之人是無法訓練其識字了。

蘇俄政府對外蒙大力掃除文盲的努力曾積極予以協助。俄國教育工作者人員早於一九三〇年代已前往外蒙從事普遍之教育策劃工作，而若干外蒙男女青年則被派赴蘇俄各大學深造研究。一九四〇年代由於初級和高級學校數量的快速增加，師資的需要也隨之迫切，而歷年增加的學校中老師亦不斷施予訓練。一九五二年以前外蒙有上千的教師或是高中畢業或是由高等學校中訓練而成，但沒有人進過專科學校。到了一九六〇年，在四、一八之中有一、二四七人從事教育工作，他們有些已受過完全的專科教育，有些僅受一部份專科教育。

外蒙古開始提倡高等教育問題，應追溯到一九四〇年因急於訓練師資而成

立了一所師範學院，此學院全部在夜間上課，第二年在烏蘭巴托又開辦了一座高等學校實施集體教育，接着在莫斯科大學協助之下設在烏蘭巴托的蒙古國立大學終於開課了。該校第一年有九十五名學生，二十年以後的今天，其學生人數業已增加到兩千名左右，有些科系發展到如同獨立學院一般，該校農學院於一九五八年就成了獨立學院。經濟系現在也是獨立學院，從前的師範學院在一九五七年改成四年制的教育專科學院。

目前全外蒙古包括烏蘭巴托的國立大學在內共有六所高級研究學校。職業學校及高級研究學院於一九六七年共畢業五百位專門人才，此一數字在全蒙人口之中雖微不足道，但對外蒙的經濟和工業發展却具有相當之重要價值。

除了初級學校和高等學校負責一般教育外，外蒙還有一些職業訓練學校，其任務為專門培育技術人員或其他各種專門職業，學制為期四年，此種學校在外蒙共有一十八所，其一般水準較美國高級職業學校略高。

外蒙古的民衆由於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逐漸增加，因而科學研究的水平得以普遍之提高。由於科學人員數目的不斷增加，促使外蒙政府決定創立一所蒙古科學研究院，該研究院於一九六一年五月正式成立，由「科學暨高等教育委員會」改編而成，其任務為研究外蒙自然資源以及於今日世界工業技術日飛猛進之時其他重要地區對外蒙生存之影響。該研究院原設五個研究所，現已擴展到十個研究所，其研究範圍包括：畜牧、農業、醫學、化學、地形、永凍層、生物、經濟、歷史和語言等。

蒙古科學研究院自稱有一所設備優良的天文台、一座令人滿意的科學圖書館，還有用蒙文自行編印出版的科學書刊，另外有些輔助設施如農業實驗站係負責發展灌溉工作。

現在，蒙古科學研究院有院士十人，通信員二十七人，其與蘇俄及世界其他進步國家之相同機構比較之下雖落後甚多，但就其過去缺乏專科教育及最近才消除文盲等情形而言，科學研究院之設立完成倒是值得讚許之事，同時它能夠在短時間內於學術成就方面也到達了相當的水準。

最早時期，宗教在蒙古的文化發展上扮演了一份重要角色。蒙古在西方實行了黃教，後來改信回教，他們在東方之轉奉佛教，那是從十六世紀以前成吉思汗時代由西藏傳來後再經普遍發揚者，其後此種佛教思想逐漸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喇嘛教今天在蒙古是極具影響力的宗教為衆所週知之事。

蒙古佛教有一項有意義的特點，就是其轉為喇嘛教後喇嘛們逐漸將寺廟成為文化傳播機構。一般喇嘛寺廟如同歐洲的教堂一樣，不但成了文化生活的中心，而且在政治、經濟方面也擔任了一份重要角色。依照外蒙習俗，每一個家庭至少要送一個男孩到寺廟中出家為僧，也就是蒙古所稱的喇嘛。這些獨身的喇嘛在全國社會結構中可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喇嘛人數不斷增加對廣大民衆而言問題頗為嚴重。舉例言之，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共產黨攫取政權的前三年

，外蒙有七百座佛寺，喇嘛十萬人，換言之在外蒙全境內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男性是獨身者。

共產黨在外蒙大肆破壞宗教以後，顯而易見的是喇嘛們都消失了，寺廟中的基層份子多參加做工或成了農民，資深的喇嘛或離開國境或被控以從事反政府活動而遭清算。到一九四〇年，外蒙的寺廟已完全停止活動而失去宗教的功能，以磚木建造的喇嘛廟全被拆散了，其拆散下來的材料則用來改建辦公室或宿舍。至於劫後倖存的寺廟大多數以「蒙古式建築物」的原因予以保存，或仿照蘇俄從前的若干教堂一樣改做博物館。在保留的寺廟中最著名有額丹尼珠寺（Erdeni-Tsu Monastery），該寺位於奧克洪河（Orkhon River）流域的烏蘭巴托之南約二百八十英里。該寺廟建於一五八六年，是外蒙地區建造的第一座寺廟，其建築的形式是以蒙古、西藏和中國三種式樣混合而成。

蒙古人生活方面受喇嘛教的影響已經逐漸衰退，祇有少數年長的蒙古人依然在甘登德欽林寺（Gandan Tekhiling）以古老方式禮拜佛像，該寺位於烏蘭巴托市之西北地區，這是唯一保存用作宗教活動的一座喇嘛廟，在該廟之中還保留喇嘛八十二人，其年齡均已老邁不堪，這恐怕要算是蒙古喇嘛教的最後遺產了。當然我們不可能對蒙古人宗教信仰的詳細數量加以統計，但無疑是有很多蒙古人為了自己安全着想，所以都隱藏了對宗教的感情。

若干年來蒙古的人口出生率總是低落的，現在每年已上升百分之二點五到百分之三。衛生保健工作的改善和獨身喇嘛人數的顯著減少固然是促進人口上升之原因，不過外蒙政府在政策上對於較大型的家庭也鼓勵其增加人口。全世界今天有很多國家因人口爆炸的危機非常嚴重，乃實行生育控制並引進人工墮胎技術及使其成為合法化，唯有外蒙古對大家庭的母親們却給予金錢或精神上之獎勵。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之間，發給這些母親們的獎金已超過四千萬突格里克（Tugriks）蒙幣，其中特別大的家庭母親們則頒授「榮譽母親」獎牌。以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兩年為例，差不多有三千個母親獲頒一等榮譽

獎牌，二萬四千個母親獲得二等榮譽獎牌，這些得獎人還收到政府發給的獎金，總數約為三百萬突格里克蒙幣。

從上述情形加以計算之結果，外蒙的人口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這四十五年之中，自五四二、六〇〇人上升到一、〇一八、九〇〇人，幾乎增加了一倍。換言之，外蒙的人口密度於一九一八年是每平方英里零點九人，到一九六三年則每平方英里為一點七二人。

出生率之增加與死亡率之降低對自然成長率當極有效益，例如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七年期間，外蒙人口的出生率從千分之三十二點三升到三十九點六，在此同時，死亡率則從千分之十四點二降到千分之九點七，此兩者因素組合之結果，則所謂自然成長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即千分之十八點一到千分之廿二點七）。

過去幾個世紀之中人口成長的結果，使外蒙社會中的年齡結構有了重大改變，所以近代的外蒙古可被列名為年青國家。據一九六五年統計，在全外蒙人口中十八歲的人佔百分之四十五。由於民眾壽命的增長（一九四〇年平均五十一歲，一九五六年是五十六歲，一九六三年則為六十四歲），所以超過四十五歲以上的人數業已增加，這種年齡的人現在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

全部外蒙人口之中還發現了一件重要現象，就是在增加的人數之中女多於男。一九五六年時外蒙當局曾作人口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女性四二五、二〇〇人，男性四二〇、五〇〇人。此種女多於男情形是造成勞動力的決定性因素。外蒙工廠裏的工人有百分之四十一以上是婦女，農業經濟的工作人員有百分之五十二點五也是婦女。婦女參與其他工作的比例情形經統計如後：

- (一) 衛生部工作人員百分之七十。
- (二) 高級研究院師生百分之三十。
- (三) 藝術工作人員百分之三十二。
- (四) 競選為庫魯兒（Kuldar）議員人數大約百分之二十二。
- (五) 擔任地方庫魯兒議員者超過百分之二十以上。

（未完待續）

西域塵談 (六)

羽田明著
宋念慈譯

游牧民族的活動

南道蕭條，北道繁榮

從公元一世紀到二世紀，方出現了連結世界兩端的官制道路。因為東方的

大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同時控制了東西交通道路——絲道的要衝。從此世界乃逐漸成為一體。看一下貨幣，也會發生同樣的感覺。在貿易上位於中間地位的印度貴霜王朝領土，即曾使用和羅馬奧雷金幣同等重量的金幣，在西域也會流通過漢字與西北印度法盧文併用、名為西諾、法盧貨幣。

可是這種在官制統制之下的道路，並未能長久維持下去。為了確保路途遙

遠的交通線，所耗費的財力太多，而同時用以支持這種道路的古代帝國，其基礎與時代而動搖，不旋踵又瀕臨了國家滅亡的危機。

三世紀之初，漢朝滅亡，中國陷入了中世的混亂時期。羅馬帝國被崛起於西方的薩珊王朝波斯（二二六—六五一），阻遏了向東方的進展。同時，一手接受了居間介紹中國與羅馬、印度之貿易的貴霜王朝，也於公元二二九年派遣使者，與魏文帝表示友好關係，屈服於薩珊勢力。因此，自三世紀至四世紀，新興的伊蘭勢力，代「羅馬的和平」而與盛起來，這對西域地方當然也發生了影響。

第一、通商道路發生了變化。前此漢朝以羅布泊西北岸樓蘭（鄯善國）為進出西域之據點，至此，貴霜王朝則改以和闐為橋頭堡了。因此，經由帕米爾之南的群山，而出至塔里木盆地之西域南道的路線，最被經常使用。但當薩珊朝波斯強大之後，自粟特地方繞帕米爾之北，通至西域北道的交通路線，始逐漸具有了重要性。

第二、自西域流入中國的文化性質，有了變化。貴霜式文化變成了印度系笈多王朝式、希臘系的羅馬式文化，變成了薩珊朝波斯式樣。於是從三世紀到六世紀的新西域史，於以展開。

飄泊的湖

自西域南道改走北道交通路線的重要度，遺失於另一個變化的原因。那就是從三世紀起，羅布泊地方逐漸乾燥化了。注入羅布泊的塔里木河水量減少了，因沙丘的移動，湖形也有了變化。羅布泊之所以被稱為「飄泊的湖」，也就是因為這種變化，後來又發生了多次的緣故。因此，在湖畔繁榮了很久的樓蘭王國，由於交通中斷和灌溉困難，便馬上蕭條起來，在湖之西岸的王都樓蘭（遺跡LA），湖之南的磨朗，統變成了廢墟，即在此一時期，根據考古學調查，推測這種情形大致是發生於四世紀之初。

前此通往西域的道路，是由敦煌到樓蘭，由此則向南北分開。可是，現在這些道路的線路有了變化，它變成了自敦煌通往羅布泊之南了。鄯善的都城由樓蘭沿着這條新路線，移往卡克里克（約當今之塔西羌——譯者）。南道其後進入了青海地方西藏人吐谷渾的支配之下。公元五一八年前往印度求法的宋雲等一行人，所採的旅行路線，即不通過河西走廊，而經由吐谷渾領的柴達木盆地，而出至鄯善。

另一方面，連結敦煌—樓蘭—焉耆的舊北道，改成了由敦煌直接向北，經過沙漠而走向哈密（伊吾）的線路。從哈密越過天山，亦可抵達巴里坤（鎮西），若向西走，則抵達吐魯番（車師）。由吐魯番更向西行，則進至焉耆，至此而與從來的北道相會合。

惟這條新路，也並非到此時才被開拓，在紀元前後，即已被開拓為軍用道

路，這點在前面也曾提到。由吐魯番越過天山亦頗容易，即可抵達焉耆木齊或濟木薩（今孚遠縣）。在天山北方有廣大的準噶爾盆地，和半脫鹽的草原地帶，那是古來遊牧民族雄飛的世界。天山山脉就是分隔這個遊牧世界，和南面農耕世界的障壁。連絡這兩個世界的哈密或吐魯番的通路，被人稱為「西域之門戶」，自有其道理。遊牧民衆使通過這一門戶，前來吐魯番綠洲，用他們的畜產物來掉換五穀等必需物品。有時也在秋收完畢之後，前來綠洲搶奪。

但當遊牧民衆勢力統一起來，並成為強大之時，交易的規模也隨着擴大，遊牧民有時用馬匹和其他家畜，交換綠洲諸國的物產和中國的絲綢。有時更由遊牧民衆自行積極地掌握西域的通商道路，向綠洲居民徵收租稅，向隊商徵收關稅，博取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把支配西域的利益輕輕放過。於是就在這裏展開了南北兩勢力的激烈爭霸戰，祇要堵塞住「西域之門戶」，便可阻遏遊牧民衆的進出。漢人兵士之所以被送至西北邊境，主要就是這樣地點。漢代曾置戍已校尉於高昌壁（後來的高昌城）和金滿城（濟木薩附近），並設置不都尉於伊吾。在該處建立城寨，平時一方面從事農耕，一方面從事防禦邊境，此即所謂屯田是也。班勇為西域長史，其駐屯之地，即為吐魯番盆地的柳中。

後漢書西域傳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軍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至此西域北道復通，故吐魯番盆地在歷史上之任務，愈形重要。

豐富的吐魯番盆地

我們一般若談起西域，總會在腦子裏浮起塔里木的存在，可是在其東北隅，還接着一個獨立的小盆地。那就是吐魯番盆地。這是一個由天山山脈的續脈博格多山，以及由天山分岐出去的庫魯克塔格山所環繞的地區。若將它和塔里木盆地相比，自然有小巫見大巫之勢，但在形狀上却很相似。東西二〇公里，南北六〇公里，裏面是沙岩的斷層槽，形似乳鉢，最低的艾丁庫爾鹽湖，深在海平面下三〇〇餘公尺。盆地的南坡為完全無水之荒地，北面的天山南麓出現許多扇狀地，形成為綠洲。東端為哈密，西端則為吐魯番。在六世紀中葉的中國歷史（北史）上，有關吐魯番地方（高昌），記述說：

「高昌國有八城，皆有漢人。地多石積。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菓（桃、李、杏、栗、棗等），人口多。有羊刺草，其上生蜜，其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美，有白鹽（岩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並以之貢我國，葡萄酒多，俗事天神（祇教），兼信佛法。國中牧羊馬，居隱僻處以避，若非貴人則不知其處，北方有赤石山，其山之北七〇里處有貧漢山，夏亦積雪。此山之北側為鐵勒的世界」（見魏書北史西域傳）。

吐魯番正如本文所述，自昔即為非常豐富之土地。本世紀之初，與德國學

者格倫耐爾 Grünwedel 偕往吐魯番從事考古調查的勒柯克 Von Le Coq (一八六〇—一九三〇)，在其旅行記中，也有同樣的記述。

「吐魯番綠洲的黃土，只要善加灌溉，便皆為沃壤。當地種植小麥和良質棉花，年收二次。葡萄、甜瓜、胡桃、阿月渾子等果實極為豐富。吐魯番地方的炎熱，至被稱為土耳其斯坦的印度，幾乎無雨，三、四月間強風吹襲，黃塵蔽空，暗淡無光。遙望北方的博格多雪山，此時已迷濛不可復見」。

但此吐魯番綠洲的豐富，實為天惠。上文我曾屢次提到，水對綠洲農業是最基本的東西。吐魯番所需要的水，是自天山頂上融化而流下的雪水，但是這水流往低地時，立被乾燥的土地所吸收。縱令在下游可有浮溜，然已成為含鹽的水分，已不適於灌溉。因此吐魯番盆地，自古即使用特殊的灌溉方法，在這裏坎井（地下水道）的灌溉方式最為發達。

坎井灌溉及其起源

所謂坎井灌溉，即雨水或融雪而成之水，順山之斜面流下，在山麓滲入地面而成為地下水，對此加以利用之方法，是謂坎井。首先在接近山麓的扇狀地頂部，掘一眼最初的井，流集在此井中的水，水量既豐而又為不含鹽分的良質水。由這第一眼井繼續向下坡挖掘，使其不比地上的斜面為陡，或幾在近乎水平地和地下水道相通，一直導向遠方，最後乃出於地面，用以為村民的飲料水，或以之灌溉耕地。它是人工的泉水，因為是從地下潛流而出，故不含鹽分，又無在途中蒸發，使水量減少之虞。

普通，坎井的全長由數公里達二、三十公里。挖掘坎井幾乎悉用人力。所使用的挖掘工具，僅為原始的木製耨揚機，自木架上繫一皮袋，將自井中掘出的土吊出。其後便僅使用鶴嘴鎬和砍土鋤而已。在工作上必須具有經驗和熟練，非專門技術工人莫辦。

坎井在國土乾燥的國家伊朗，似自最早時期即已發達。目前伊朗稱坎井為卡納特（阿拉伯語）。此種地下水道在圍繞伊朗東南部卡維爾沙漠，以及路特沙漠地區多有之。與伊朗接壤的阿富汗達哈爾、赫拉特和庫萊達等地亦有分布。在中亞費爾噶那（舊大宛）盆地，利用扇形地的地形，坎井式的灌溉非常發達。另外在塔里木盆地地方，聽說也有若干實例，直到吐魯番盆地。吐魯番盆地為坎井灌溉的東端。

勒柯克記述說吐魯番盆地居民，是用波斯語 *Karen* 的名稱來稱呼此種地下水道的。中國則從音譯譯為坎井或坎兒井。管理坎井之人稱為米拉布（水官），或稱為巴郎·大得（施雨者），而土耳其語則呼為斯·奴恩·貝給（*Sunun begi* 水的支配者）。

這種伊朗式的坎兒井，是打從何時，並怎樣傳入吐魯番盆地的，不太明瞭。如前所述，在記錄上僅能上溯到一五世紀。但假如吐魯番綠洲的肥沃，是

有負於此種優越的灌溉技術，則將坎井式灌溉的起源，更往前追溯一些似無不可。

前引魏書西域傳中所謂「引水溉田」之語，說不定也就包含了坎井灌溉。當時吐魯番的居民倘若所信者是祇教（拜火教），則他們蒙受波斯文化的影響，定無可疑。在四、五世紀時，坎井灌溉恐已以薩珊朝波斯之發展為背景，傳到吐魯番盆地了。

高昌的廢墟

在吐魯番盆地之中，有一會由格倫耐爾和勒柯克調查過的高昌廢墟。它是古代漢人所建的高昌王國都城遺址，後來被維吾爾人佔據，亦稱亦都護城（今名哈刺和卓 *Karakhoja* 乃據維吾爾語發音，另為什縣亦有一地名哈刺和卓，與此有異——譯者）。

在該一由城牆所環繞的城市之內部，還有不少頹廢了的建築物。但其中並無一處中國式的，全部均為土磚所建造，其中有波斯型的圓蓋或穹窿的建築，不然便是印度階段式的佛塔。用土磚構築圓蓋或穹窿，必須具有特殊技術。在哈刺和卓殘餘下來的土磚堆砌建築物，譬如寺院 B 等，即與薩珊朝的庫特西風大宮殿或薩爾威斯坦宮殿建築，極為相似。尤其是在正方形設計的房間，覆有圓蓋的方法等項，可說完全就是波斯型建築。假如說吐魯番居民在建築方面，非常善於運用薩珊技術，則上面所提到的波斯坎井的起源，自然也有其關連，可謂興味盎然。

李柏將軍的書信

西域北道逐漸改由吐魯番通過，乃由於樓蘭地方的荒廢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吐魯番地方，移來了大量的漢族人民，是亦為其重大原因。自三世紀以來，為避戰亂，有很多中國流民逃入吐魯番。在當地原有一種說屬於阿利安系語言的西域綠洲居民。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逾越天山，殘留着向南北移動的游牧風俗之帳幕生活者。漢人在此等土著民之中，建築城郭定居。因戰亂關係，與故鄉的連絡中斷，以致發生了獨立的氣運。

例如，在甘肅走廊地帶成立的幾個王國，所謂五涼王國之一的前涼（三一三—三七六）之時，由當代派為高昌郡太守，駐節於吐魯番的趙貞，不服前涼新國王張駿之命令，於是張駿派西域長史李柏將軍出兵吐魯番，結果失敗，張駿乃親自出征，鎮壓了吐魯番。

有關這一事件的史料，到本世紀，於一偶然機會中，經大谷探險隊發現於羅布泊湖畔。這封書信是李柏將軍行將進攻趙貞，進軍羅布泊海頭時，寫給焉耆王的書信。它的草稿有數件之多，這是寫着五月七日日期的短信（公元三二八年）。書信所用的是和漢代不同的新楷書字體，寫於紙上。這在了解當時的

墨書上，也是非常貴重的資料。

漢人所建立的王國

其後，吐魯番盆地之經營，即由張駿的子孫所繼承。然後更由前秦的苻堅、後涼的呂光、西涼的李暠父子、北涼的沮渠蒙孫等所繼承，除前秦之外的四王朝和前涼，即五涼王國也。最後匈奴系的沮渠蒙孫，僅以不足二〇年的時間，即爲出身鮮卑族的北魏所滅（四三九年）。

此時，蒙孫的兒子沮渠無諱和安周等兄弟，佔據樓蘭地方，由此進窺吐魯番。然另一夥的逃亡漢人，自哈密（伊吾）來到吐魯番。他們是當漢族系的西涼，爲北涼所滅之際（四二一年），流亡到哈密，並在當地保存了實力的集團。這一集團由唐契、唐和弟兄所率領，並以其時來自蒙古、雄飛於西域的蒙古系游牧民族柔然（蠕蠕）爲後盾。柔然發覺了，他們將策劃與北魏相結託之事，因被逐出哈密。

當時高昌城之城主爲漢人闕爽，因感環境危險而求救於樓蘭地方的沮渠兄弟。其實是誘使唐氏兄弟與之交戰，而希圖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然唐氏兄弟的勢力，不久即爲柔然進兵所破，沮渠兄弟攻佔了高昌城，城主闕爽無奈投奔柔然。沮渠無諱其後不久死亡，其弟安周代之而立，因得柔然之協助，滅吐魯番土著人民所建之車師國，終將吐魯番盆地全部收歸掌握之中。此爲漢人高昌王國的起源（四五〇年）。

沮渠蒙孫和安周所佔據的高昌城，即爲現在位於吐魯番城東南五〇公里處的哈刺和卓（亦都護城）遺跡。

關於這一遺跡的薩珊風格的建築物，前文業經提及，一座用涼王大沮渠安周的名字所刻的造寺碑，即在此處發現。沮渠無諱和安周，在吐魯番獨立之後，立即與南朝的宋朝通好，但來自天山北方虎視眈眈游牧民族的勢力，自屬極爲強大。四六〇年，柔然擊退安周，以闕伯周爲高昌王。這位闕伯周，恐即曾爲沮渠無諱及安周所斥責，而消跡匿跡於柔然的闕爽一族。其後在準噶爾方面得勢的土耳其族高車，一時壓服了柔然，立敦煌漢人張孟明爲高昌國王。然此舉因遭民衆的反對而失敗，乃又改立馬儒爲王，馬儒藉助北魏，頻思移往內地，但自古即已在吐魯番住慣的漢人，不欲離此他往，乃廢馬儒而立麴嘉爲王。麴嘉直至其後被唐太宗滅亡爲止（六四〇年），爲延續一四三年間麴氏高昌王國國祚之祖。

漢人王國雖延續很久，但從任何方面來說，仍爲一左右於天山北路游牧民族勢力的傀儡政權。雖說是游牧民族，因爲他們仍以承認綠洲各國之存在，將東西貿易委諸漢人與西域商人之手，而坐收利益實爲得策。隋唐高昌傳謂突厥族之鐵勒，「常遣重臣在高昌國，如有往來商胡，則課稅」。高昌國與游牧民族之關係，似亦建立於此種互相依存關係之上。由麴氏一族所確立起來的高

昌國，其得以維持小康狀態，雖屬形式的，然而它也能仿行中國格局的中央政府組織，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建立了獨自的年號。當時尚鑄造有「高昌吉利」四字的銅錢，頗爲有名。他們是佛教徒，故高官貴人死後，均按中國墓葬風俗，予以厚葬。其墓地即距哈刺和卓不遠的阿斯塔那遺跡。

當時也有學校，教授子弟毛詩、論語、孝經等中國古典，惟誦讀時則均用胡語發音。文字亦漢字與胡書雙方並用。胡語殆爲吐火羅語，而胡書殆爲婆羅門文字。婦女着中國式長褲，髮結髻，男子則穿筒袖與長褲之胡服。此等漢人身穿胡服，口操胡語，雜於西域商人之間從事活躍。

汗的起源

從天山背後支配吐魯番盆地的漢人，和西域綠洲各國的游牧民族勢力，究竟是什麼樣的勢力？

後漢末中國本土發生變亂，長城以北的游牧民衆，紛紛侵入華北。這就是所謂之五胡，匈奴的殘部和蒙古系的鮮卑，佔其主要部分。其後在蒙古地方擁有實力者，仍爲蒙古系的柔然。柔然的君主，初次使用「可汗」稱號，並稱其配偶爲「可賀敦」。此一「可汗」之稱呼，即爲皇帝之意，後來在游牧人民之間被廣泛使用的哈干、汗等名稱，都以此爲起源。可賀敦與哈賀敦、哈敦相對應。

與此一蒙古系游牧民一面對抗，一面又逐漸儲備了勢力者，是高車、鐵勒、突厥等游牧的古代土耳其民族。一般相信突厥爲鐵勒（Turk）（土耳其）的複數形。五四六年，當鐵勒攻擊柔然時，突厥部族長之土門，曾壓制鐵勒而援助柔然。土門恃此種功績，向柔然求婚，柔然王阿那瓌怒曰：「爾是我鐵奴，何敢發是言邪！」

然當時情勢已於柔然不利，支配鐵勒諸部的土門勢力，已有凌駕阿那瓌而上之勢。

在柔然方面，阿那瓌之兄醜奴先在位。其時在游牧人民之間，深信薩滿教之呪術，當時曾有一奇妙之事件發生，當醜奴即位不久，走失了一子。醜奴夫妻對這名叫祖惠的兒子之走失，終日想念，悲歎不置。其後有一名爲地萬之二〇歲的巫女，自薦於醜奴，說祖惠現在天上，她能將其喚回。

醜奴及其母大爲歡喜，乃令其速將祖惠找回。中秋之日張天幕於大澤之中，潔身誦經，作法七日，天明時祖惠果出現於天幕之中，且自稱一直居住天上。醜奴抱擁祖惠，喜極而泣，乃即時傳令部族集會，以巫女地萬爲聖女，並決定立其爲正式之妻——可賀敦。復界予地萬之夫以爵位及牛、馬、羊三千頭，作爲獎賞。地萬成爲可賀敦後，行爲逸於常軌，然以貌美多姿，醜奴深爲所惑。國政日趨紊亂。若干年後，祖惠長大。某日醜奴之母詢問祖惠各種情形，祖惠具以一向居住於地萬之家之事相告，實無登天之事，所謂登天乃爲地萬所教

唆。其母立即將此情形告知醜奴，但醜奴以為地萬的神諭不可不信。對她不能置疑。

母親的忠告反遭拒斥，但地萬深恐謊言被拆穿，乃囑醜奴殺祖惠。唾棄兒子這種愚蠢行為的母后，與臣下商議，先殺了地萬，接着出征於對高車之戰爭，敗北而返，醜奴亦被殺。於是其弟阿那瓊繼承了王位。

黃金及鐵之國

突厥部族之長土門，以柔然王阿那瓊拒絕其通婚之請為契機，即據自高車以來即為突厥族之根據地的阿爾泰山麓獨立起來。誠如阿爾泰有「金子」的意思一樣，該地出產黃金，同時它擁有鐵、煤和礦石的資源。起初，突厥部族原隸屬於柔然，從事鍛鐵工作。鐵礦散布於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的許多地方，庫車（龜茲）和喀什（疏勒）也曾將鐵供給突厥。

突厥的土門既經獨立，對柔然頻加攻擊，終迫阿那瓊自殺。其後柔然之勢力自漸削弱，終致消失於蒙古地方。土門代之而興為突厥最初之可汗，稱為伊利可汗。「伊利」為土耳其語「國土」之意。他支配的領域，東自興安嶺，西迄粟特地方南境的鐵門。然突厥的古代土耳其帝國，自建國之初，既已以阿爾泰山為界，分為兩大勢力。東突厥以蒙古之鄂爾渾河流域為中心，西突厥則以準噶爾盆地及天山北麓為勢力範圍。

與西域直接發生深入關係者，在兩突厥之中，以西突厥方面為主。西突厥之可汗室點密 Striboul or Dizioul，設王庭於天山谿谷之中，繼柔然、高車（鐵勒）支配了吐魯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西突厥的統葉護可汗，予西域各國國王以名為頡利發的突厥官職。相傳即由突厥方面派委所謂「吐屯」的督導官實行收稅。

另一方面西突厥更與薩珊朝締結同盟關係，自東西兩方挾擊自阿富汗北部向西域伸張勢力的土耳其系，或為最後之伊朗系游牧人民的也夫它族，致於滅亡。

室點密可汗征服了西域阿姆河的中亞一帶，與薩珊朝的波斯，成為鄰國，公元五六八年復派康居人使臣馬尼阿克 Marach，遠至東羅馬帝國普謁查士丁皇帝。早經歛譽為西域商業民族的粟特人，由其成為使者，從而可知這是一個貿易使節。他們一行人並不通過薩珊朝的波斯領土，而係繞道裏海之北，由高加索自北而南，直達伊斯坦堡。總之，他們就是想經由「草原的道路」，而直接與東羅馬進行交易。

西突厥在派遣使節到拜贊廷之前，也派了同一粟特人馬尼阿克，到薩珊朝厚斯洛一世處，使其進行交涉絲綢貿易。然在厚斯洛王朝裏有一也夫它人。這也夫它族，或在其支配下的吐火羅人，在其領土被西突厥佔奪之前，也是與中

國有極好的絲綢貿易關係。在中國的記錄裏他們不獨和北朝，即通過吐谷渾的住地，和南朝也有商業往來。

也夫它人當然非常討厭吐厥，所以勸說厚斯洛王，將馬尼阿克所帶來的絹全部買下，當民衆面前盡行燒燬。這就是說，凡由土耳其領土前來的絲織品，一切不予使用。在這種情形下，馬尼阿克對薩珊朝波斯的交涉，歸於失敗，歸返西突厥向其可汗報命，因絲織品的銷路被薩珊朝的波斯所拒絕，故以後必須直接向東羅馬尋找出路了。

東羅馬的查斯丁皇帝，當馬尼阿克回國之際，又派一位名叫則瑪爾克 No. marque 之人，前往突厥答禮。但後來因突厥內部政變等原因，經由「草原道路」的東西貿易，似並無若何進展。唯此種史話，在其將遊牧民族勢力與粟特商人，拉攏在一起，而做為共存關係之舉，實最為明顯，亦極具意義。

高昌王國的末路

遺有「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流傳後世的玄奘三藏法師，啓程前往印度取經時，在六二七年（貞觀元年，一說為貞觀三年）。建國不久的唐朝，威力尚未達於塞外。按當時的情形，雖屬出家人，也是嚴禁出國旅行的，因此，玄奘的旅行，最初還是冒著違禁令，嘗試著艱苦逃亡生活的，乘夜黑風高偷越國境之後，不久，受到了高昌國王麴文泰的歡迎。這件事由其結果來看，對玄奘而言，還成了意外的幸運。當時的高昌國，雖亦有廟宇，和許多出家人，但當麴文泰看到了玄奘的為人，他想一定要把他留在身邊。雖幾經勸說，但終無法使這位熱心求法的青年和尚回心轉意。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麴文泰與他相約，在歸國途中，一定在高昌停留三年，遂把他送往印度。

麴文泰贈給玄奘往返二〇年分的程儀，黃金一〇兩，銀錢三萬，及綾、絹等五〇〇疋。僅由這一點從而可知麴文泰對他的期待，是多麼大了。麴文泰更以親筆書信，分致前途各國國王，懇求為玄奘供給驛馬，送至次一國家，對每一國家分別贈送大綾一疋為禮。對當時西突厥的統葉護可汗，則特別託為贈送綾絹五〇〇疋，及水果兩車。他在致可汗的信中說：

「法師為我弟，往印度求佛法，乞賜照拂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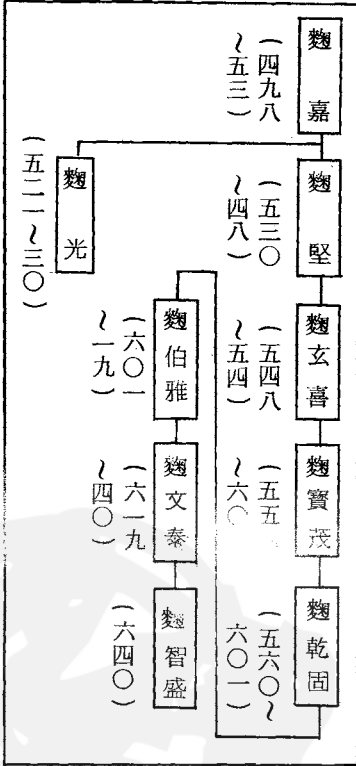
當時的國際情勢，對高昌國已漸趨艱難。因在中國本土已出現一個強力的統一政權之唐朝。一方面高昌和西突厥的關係，一向繼續維持不斷，麴文泰之父，伯雅雅之祖母乃突厥可汗之女。高昌為與西突厥保持親善關係，乃欲使從事西域貿易之商品、隊商，悉數經由其國家，藉以謀取重利。

然自唐之觀點言，又不能令絲路長由高昌所獨佔。可是高昌的背後，有西突厥為之撐腰，其勢亦不可侮，方欲就近與伊吾聯合，高昌果與西突厥聯軍攻陷伊吾。高昌之西的焉耆，欲橫渡維布沙漢，恢復直抵敦煌的西域北道，唐擬給予支援，而高昌王又與西突厥聯合攻略焉耆，予以阻礙。唐與高昌的敵對關

係益趨表面化。唐太宗遣使問狀，文泰對者：

「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噬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至此，他已明白表示生存之道，唯有靠本國的獨立來維持了。

玄奘於自高昌出發後的第十二年，亦即尚在印度求學的公元六三九年（貞觀十三年），唐太宗終於發兵對高昌大張捷伐。文泰憂懼病發而死，其子智盛以城降。



高昌國王系譜

自公元四九八年以來，麹氏高昌王國，共傳九代，至此而滅亡。後此又二年，玄奘始知文泰之死。

北道各國

現在我們再隨玄奘大師的腳踪看一看。大師一行入從高昌國走向焉耆（阿耨尼）。途中碰到幾十名粟特商人（即所謂胡商），而結成了伴侶，來到了都城不遠處，當夜露宿於河畔。但在夜半，商人們却悄悄地先行出發了。這是因為他們想要搶先進城，以便對於買賣有利。可是次日清晨，商人們在途中遇到強盜，全部被殺。商人們賺的錢雖多，但是由於競爭劇烈，性命的危險亦多。焉耆地方為一富庶的綠洲，佛教亦盛，前面也曾提到，它和鄰邦的高昌國，感情極壞，所以玄奘大師到時，它不肯提供驛馬。大師等祇在此投宿一夜，即出發前往庫車（龜茲、屈支）。

庫車聞大師來，王以下諸大臣均郊迎於城外，遙近廟宇的僧侶，均集於城門，供奉佛像於帳幕之中，奏樂歡迎。庫車的管弦、伎樂的出色，早已馳譽各國，後來也輸入到唐朝。庫車王是當地土著人，這和高昌是不同的。這處是北道唯一的大綠洲，地當交通要衝，自古即為商品的集散地，極為興盛。居民多為商工業者，製鐵工業亦自古馳名，尚有公營的青樓遊廊。這真是往來商旅龐大的遊樂投宿之處。

玄奘大師偶而投宿到一個在城裏由高昌人建築的寺廟之中。庫車有一位名叫木叉毘多的老僧，曾留學印度習佛二〇餘年，他對大師說：「庫車已有『維心』、『俱舍』、『毗婆沙』等經典，似無遠路再向印度求取之必要。」「俱舍論和毗婆沙論，我已在中國學到了。可是這裏有瑜伽論麼？」大師問道。木叉毘多說：「為何要尋求邪見之書呢？真的佛教徒是不念那種經的。」

其實唯有「瑜伽論」纔是大師未能在中國充分學習，而決心向印度求取的經典。因為它被指為邪見之書，故與木叉毘多爭論，結果乃知木叉毘多的知識，僅止於小乘佛教，並非是玄奘大師所要求的廣大的大乘佛教。當時西域北道的佛教，均屬以說一切有部派等的小乘佛教為主流，並非庫車一地為然。

庫車是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鳩摩羅什（三五〇-四〇九左右，或謂四一三年）名僧出生之地。羅什之父為印度人，母為庫車國王之妹。九歲時，隨同出家為尼之母親，參學罽賓，學習說一切有部派的小乘佛教。其後有機會接觸到大乘經典，自此乃轉向於大乘佛教之宣揚。但不久庫車為前秦苻堅所派的呂光軍隊所破，羅什被帶至中國（三八四年）。苻堅早慕羅什之名，故命呂光「如破庫車，即驛傳馳送入京」。南北朝時代的中國佛教，有負於鳩摩羅什之漢譯經典者極多。羅什被迎至中國，庫車的佛教復為傳統的小乘佛教所佔據。

石窟廟宇和壁畫

庫車以佛教遺蹟石窟廟宇之多為特色。就中以丁谷山千佛洞為首，其他如庫姆吐喇、斯巴西、基利修等石窟群，亦為人所知。洞窟大抵都開鑿於美麗的峽谷和斷崖之上。倘若戰勝了開鑿岩石的困難，則洞窟既可躲避酷烈的寒氣，又可以防風雨。因為它離開了市井的喧囂，對於修行最為理想。談起石窟廟宇，在印度有阿占塔山石窟寺院，阿富汗亦多有此類寺院，在西域方面，沿北道可見有石窟寺院，經吐魯番與敦煌，直迄山西之雲岡、龍門，均有偉大之石窟寺院。平地的寺院是依照建築物的種類，而配置伽藍，石窟寺院也是由一種組合而成的。僧侶們生活的石窟（僧房），形狀小而比較質素，但安置佛像和佛像的石窟（誦經堂）均屬大型，裏面全由影像和壁畫美麗地裝飾着，由一個禮拜堂為中心，而由若干僧房聚集起來形成一個寺院。

尚殘存有美麗壁畫並最為人習知的丁谷山千佛洞，位於庫車西北，開鑿於面臨木扎特河急流的斷崖之上。在具有壁畫之誦經堂的洞窟，有一定的格式。普通多為在入口處有一廣大的前室，裏面則為兩間方形或長方形的後室，在後室的裏牆上，安置佛像和基壇，並將其左右鑿通為迴廊，以與後面相連。影像之類幾已遺失殆盡，唯在牆面上所裝飾的壁畫，尚比較有些殘餘。一般地，在主室的左右側壁，都描繪着釋迦說法圖，再添加些佛傳圖和本生譚。迴廊的側壁上則描繪俗人的施主和供養者的容貌。後室裏牆的前後，則畫着佛陀的涅槃和佛舍利的分配。

在丁谷山誦經堂石室裏，也有少數不帶迴廊（繞道）的構造格式，其中有的是沒有前室的方形石窟，有的是長的半圓筒形的石窟。帶有迴廊的石窟形式，在印度是開始於收納佛塔於石窟的形式。迴廊都是圍繞於佛塔的周圍，做為供養的繞道。假如佛像擴大，則把它放於佛塔之前。這種格式，相信是從笈多朝 Gupta Dynasty 的印度，直接給予丁谷山石窟影響的。在中間的阿富汗石窟，便幾乎看不到那種形式。若僅就丁谷山而言，在壁畫的樣式方面，沒有迴廊的石窟形式，似較古老。

丁谷山壁的樣式，可區別為兩大類，在古老的樣式方面，在模倣物的形態方法上，較為粗放，畫輪郭時線條柔和，加上濃淡的陰影，而使之發圓。彩色是使用淺粉、黃、褐色、黑褐色等同系色為基準，土耳其石的白線是用做唯一的對照顏色。在新的樣式方面，是在能確實把握住物的輪郭，以細而硬的線條加以勾勒。彩色是選擇有對照的顏色，在將青金石 lapis lazuli 碾成粉末的紺青，使白色、黑褐色、綠色與之對照，以發生強烈的彩色效果。很難具有新樣式的輪郭線，或伊朗系人物的服裝等，都和在此揚吉坎特及巴拉爾依克等西土耳其斯坦地方，所發現的薩珊風格的壁畫，有其共同之點。

穿綠袍的人們

現在我們再談談玄奘大師的行程。他們的「大車庫車」再往西行，渡越了巴達爾險隘，便降到天山的北方，在此走到了一個大湖的湖畔，這就是現在的伊西克泊。因為自湖底冒出溫泉，冬季亦不結凍，因此當時以熱海之名而為世人所知。伊西克泊土耳其語的名字，也具有同一意義。由該湖畔西北行，出至素（碎）葉城。大師在此遇到西突厥的統葉護可汗，其時可汗正在前往狩獵的途中。可汗身穿綠綫長袍露髮，以一丈餘帛練裹額垂垂，隨行的達官貴族二百餘人，亦皆穿錦袍編髮，圍繞左右，編長髮垂後，乃蒙古系和突厥系諸游牧民族，自古以來的習慣。與此相反，伊朗系的土著人民，像一般在壁畫所見一樣，均將頭髮剪短。玄奘等先可汗而到達了可汗的帳幕，以待可汗自狩獵歸來。三日後，可汗歸至王庭。他看到高昌王麴文泰的親筆書信和禮品，高興異常，立即設宴款待。

可汗以下的突厥人，鋪毯而坐。據玄奘大師說，他們都是拜火教徒，並且相信木製的椅子能生火，故而免坐。突厥人演奏熱鬧的首樂，推盃換盞，俄爾在大師面前堆陳了如山的牛羊肉。大師以身為僧伽，不便食肉，乃另以葡萄酒、麵餅、馬乳、蜂蜜等款待佳賓。

可汗忠告大師說「印度酷熱，不宜居住，且易罹疾病，以不去為宜」，大師當然不會聽信而變心。於是可汗遣一能通中國及西方語言的青年，担任翻譯與嚮導，對途中經過的國家，可汗均有親筆函件介紹，使嚮導護送至迦畢試國（現在阿富汗加布爾附近）。當時可汗的勢力，南抵興都庫什山之南，正為西

突厥的全盛時期。

其後玄奘大師等一行，離開西突厥王庭西行。過沮邏斯、石國（塔什干），遂進至河中 Transoxiana，亦即錫爾、阿姆兩河的中間地帶也。這一帶為粟特人的中心地區，撒爾爾罕為其代表的城市。由此經所謂鐵門，兩側有山崖陡立的隘路，而抵達阿姆河之北岸，鐵門即今之 Termit 以前這裏曾經是突厥與薩珊朝波斯的境界，而現在突厥的勢力，更向南伸展了。大師一行由此渡過阿姆河，抵達浩國（現在的 Kundur）。該地是由統葉護可汗的長子咀度設所統治。他也是高昌王麴文泰的妹婿。玄奘大師抵達之時，王妃已故，咀度設亦在病中。他接讀麴文泰的來信，歡喜得泫然淚下，這位國王亦於玄奘師留此之時病故。玄奘旋經新王之建議，前往縛喝羅國，即今日之巴爾赫 Balkh（昔日之巴克特利亞首都），並由當地前往印度。當時巴爾赫有僧伽三〇〇〇餘人，有多數寺塔，佛教極為興盛。

帶角的帽子

玄奘大師於長期居留於印度之後，並沒有忘記和高昌王的前約，採取了同一道路踏上歸途。

公元六四四（貞觀一七）年，一行抵達阿姆河南岸的浩國，那時浩國正由統葉護可汗的孫子掌國。玄奘大師至此方知麴文泰的死訊和高昌被唐所滅的消息，至於統葉護可汗於與玄奘分別後的翌年，即被其伯父莫賀咄所殺，也是到此後纔聽說的。由於西域情勢的意外變化，玄奘取消了北行的計劃，而改採東向最短距離回歸本國的道路。即經現在的阿富汗而接近新疆的路綫。

其後不久，溯俱蘭河 Kuran or Kakcha R. 而上，至巴達克山地方，此地高度既高，又為一由群山所包圍的盆地。比浩國附近的平地，在季節上猶約晚一個月左右，但仍為一出產蘋果、桃子、葡萄、栗子等水果極為豐富的地方。玄奘於進入此一盆地之前，遇到了名叫西摩咀羅，過着帳幕生活的游牧民族。這一游牧民族的人民，有頭戴角帽的奇異風俗。角有兩枝，父死則去其上枝，母死則去其下枝，如雙親俱逝，則去帽而不戴，亦異俗也。

現在我們再稍微談西摩咀羅（Himatare）游牧人民之事。

公元五一九年，和玄奘正相反地由此道前往印度巡禮的和尚宋雲，在巴達克山附近，碰到了頭戴附有奇妙獸角之帽子的婦人，他把這種游牧人民稱為嚧嚧。玄奘所稱的嚧摩旦羅，亦即此嚧嚧游牧民的變音。宋雲晤見了嚧嚧王。大帳幕之中，以絨毯鋪地，衣錦袍，王坐於金的胡床（有靠背的椅子）。牀腳象形鳳凰。王妃亦穿錦衣，長裙曳地，而由侍女捧持，頭戴美麗而有角的帽子。大臣及其夫人的服裝亦同此華麗。諸國之向嚧嚧族納貢者，南至印度，北至突厥族，東至和闐，西至薩珊朝的波斯。

據波斯記錄說，嚧嚧王阿夫修拿瓦爾，與薩珊朝波斯戰，殺波斯王羅茲（

四五七（四八四）於戰場，噉噬之名聞於世界。宋雲所途遇的噉噬族，顯為其最盛期。從巴達克山出至塔里木盆地，以和闐為橋頭堡，而與天山北方的柔然爭霸，復派遣其子孫到西北印度的健馱羅，實施統治。此種行動，其目的在於掌握東西通商道路，自不待言。在西北方可以伸張勢力於粟特地方，且阻止薩珊朝向東方的進展。正值薩珊朝波斯對噉噬伺機尋復仇的當兒，西突厥自天山北方，在壓制鐵勒和柔然行動上，嶄露頭角。於是薩珊朝與西突厥結為同盟，挾擊噉噬，撲滅其勢力。西突厥的貿易使節粟特人馬尼阿克，出現於薩珊朝波斯和拜贊廷（五六八）的時間，即在噉噬滅亡之後不久。領土被奪的噉噬，不得已又撤退到原來的故鄉。這就是玄奘大師在巴達克山的山中所遇到的噉噬游牧人民。

噉噬游牧人民能在這種山岳地帶，變成強大，亦自有其道理。第一個是它位據交通要津。自巴達克山通往瓦罕峽谷，渡過帕米爾，立即出至塔里木盆地。為循玄奘的來路往回走，則可出至昆杜茲（活國）和巴爾克，很容易地可以南至印度，西至波斯，北至粟特地方。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巴達克山為多數游牧人民所集居之處。宋雲和玄奘遇見噉噬之處，現在仍有一個叫亞克塔爾的地名。它正位於現在巴達克山州的首邑懷扎巴德（Faizabad）的邊緣。

一進入五月，沿扣克恰河的游牧人民集團，便接踵攀登巴達克山。從現在的亞克塔爾地區，更往前深入，都集聚於尸棄尼的謝瓦湖周圍。那裏是水草豐茂的夏季上好宿營地。

到了九月，游牧民衆便開始下山，進入冬窩。從前似乎是逾越與都庫什山脈，移動到堪達哈爾一帶，現在則處在昆杜茲周圍的丘陵地帶過冬。昆杜茲河兩側所有的河岸段丘，是一種名為達修特的荒地，在那裏僅能生長沙漠性植物，游牧民衆便以之做為放牧地。

游牧人民就在這種丘陵上搭蓋帳幕，在寬廣的達修特上，棉羊、山羊和駱駝群隨處逍遙，靠著冬季的一點點雨雪，在春季的達修特上，也冒出來青芽。到了達修特也變熱了的五月，游牧民衆再驅趕家畜上山。這種人便是阿富汗人。

西域的佛像，羅馬人的眼目

玄奘大師離開巴達克山，經帕米爾而進入塔里木盆地。再經喀什和葉城而抵達于闐（和闐）。于闐城在墨玉與白玉兩河之間，正像這兩個地名所表示的一樣，和闐自古即以產玉聞名於世。在塔里木盆地之中，因為此地和印度的距

離最短，故印度文化與佛教文化，亦最早傳到。這由此地出土的佛教美術，以及法盧文字、婆羅門文字的文件，貨幣等，可以明白的看出。

在塔里木盆地可以看到的最早期的佛教美術樣式，即為在印度西北部開花的健陀羅系美術，它首先傳到和闐，約略在同一時期，又循南道向東傳到了樓蘭。自其遺痕方面說，現在勿寧說在尼雅和磨朗的遺跡，比較和闐尤為顯著。尤其是圍繞磨朗第三寺址和第五寺址佛塔的迴廊側壁之壁畫，其所受健陀羅佛教美術的影響，實遠不及羅馬風格繪畫的特長。大而開闊的眼睛，是非常寫實的表現。在健陀羅地方，壁畫已幾乎完全無存，所以當我們看到西域磨朗壁畫所呈現的顯著影響，至感驚異。

在磨朗壁畫之中，有一幅畫着六名和尚和佛陀像。六名和尚剃着光頭，但佛陀却留有頭髮，有睜大的眼睛，留有口髭，這對於在後世看慣了佛祖那種充滿威嚴與慈悲容顏的人們來說，實在覺得有些可笑。僅有背光和僧衣，尚能顯示出佛陀的樣子。由和闐也有金銅佛頭發現。大眼睛和口髭，在在都與磨朗的佛陀相似，同時健陀羅的初期石像，也可從這裏找出其模式。到五世紀時，印度笈多朝樣式的佛教美術，又重新在和闐發生了影響。和闐東北方拉瓦克寺院的彫像，就屬於此。薄衣緊貼着身體，由於這衣服，可以充分表現出身體的鼓脹之處。這種印度笈多樣式的佛教美術，比較起健陀羅美術之幾乎僅限於西域南道，而它却以和闐與庫車為中心，廣泛地流行於南北兩道，故其遺留下來的作品，也因之遠為眾多。

中國法顯和尚前往印度求法，時在公元三九九年，適值西域的佛教日趨興盛之時。他來到和闐，目觀當地佛教的盛況而感到驚異。在民家的門前都建有小佛塔，也有客僧住宿的設備。這裏所流行的是以大乘佛教為主，以瞿摩帝寺廟為最大。有和尚三〇〇〇人，深得國王信任。法顯起程之時，適當呂光陪同鳩摩羅什自庫車前來中國之際，當時中國對佛教經典尚未充分俱備。法顯逗留於和闐期間，親身看到了釋迦牟尼佛誕祭典，舉行行像儀式。所謂行像，即將日常寺院所供養的尊像，載之車上，在街衢巡遊，接受供養之意。行像的遊行始於四月一日。城內街道皆清掃乾淨，裝飾美麗。王及王妃張天幕於城門之上，於此迎接行像。行像最初之日由瞿摩帝寺開始。尊像被請放置於城外所準備的四輪車佛殿之上。佛像居中，左右排列菩薩，用天蓋遮陽。周圍懸掛用金銀葉板所打造的飛天。佛和菩薩三尊像的配置，令人想起健陀羅美術後期盛行製做的釋迦說法圖的浮彫。行像行列行近城門時，國王摘下王冠，換穿新衣，徒跣而進。從者持香花。王頭頂佛足，供花燒香。於是行像通過城門，在城樓上之王妃和侍女都紛紛散落鮮花。和闐有大寺十四，一日一寺行像，故此祭典須十四日方完。此項佛誕行像儀式，後來在中國亦極為盛行，此在記錄洛陽各寺院行事的「洛陽伽藍記」中，記述綽綽有餘。近年來在日本各寺廟所舉行之灌佛會，亦即此種佛教的行事。

玄奘大師曾在和闐停留了一些日子。那是因為當他在歸國途中渡印度河之際，賦載行李的大象斃死，損失了許多經典所致。於是他遣人到喀什噶爾和庫車，蒐集經典。得到經典之後，他纔離開和闐，而踏上了最後的歸程。他停留於和闐期間，他接到了唐太宗歡迎他歸國的親筆函。大師由和闐經尼雅渡過

大沙漠，抵安得悅（Andere）地屬現在之吉且末縣。斯坦因以為西域記尼壤城東之都貨邏故國及賈耽四夷路程之闐城，似在斯地。都城已荒廢。樓蘭與庫爾成（且末國）亦荒無人煙。樓蘭久已變成廢墟。玄奘大師是於貞觀一九年（公元六四五），通過了曾經繁榮一時的南道廢墟，經過十七年又重歸故國。（待續）

我創辦「綏遠文獻社」的想法與做法

李啓元

我政府遷台以來，生聚教訓，莊敬自強，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使生活安定的來台同胞，多已淡忘故鄉。近年來各省市來台人士，爲了復興文化重建鄉邦，都紛紛致力於地方文獻之整理與發揚，以期延續地方文獻，加強愛鄉觀念，計先後創辦省（市）縣文獻社、編刊刊物、影印方志者，已有四十餘省（市）縣。我是綏遠人，又是中國地方文獻學會會員，每逢開會晤談時，都有好友催促我創辦「綏遠文獻」。同時，我自認也有責任創辦此一不可缺少的刊物，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考慮與研究以及鄉長們的鼓勵，我就不揣譾陋，毅然決然的担負起此一艱巨的創辦工作。

家族應有譜牒，省縣應有方志。所謂方志，就是地方之志。依照向例，在中央者謂之史，在地方者謂之志。志與史本無不同，其所以稱方志者是爲了與國史有所區別，如某省志就是某省史，某縣志就是某縣史。所以方志就是每一省（市）縣之歷史紀錄，載有山川地理之沿革、鄉賢活動事蹟及文物典故等等。我國政府對於國史及方志之編纂，向極重視，北伐成功後，在中央設有國史館，在地方均須設置省縣志館，如內政部於十八年十二月呈奉行政院轉奉國民政府令頒發之「修志事例概要」，就明定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志館，由省府聘請館長一人，編纂若干人組織之。各縣（市）興修志書應行規定事項，由各省通志館參照上述概要定之。綏遠省遵照中央規定於民國二十年李培基（涵澂）主持省政時，籌款十萬，設立省通志館，以歸綏郭象汲（井卿）先生爲館長，聘請曾於民國十四、五年任綏遠省教育廳長之察省籍李泰萊先生爲總纂，王森然、王文墀、白映星（鏡潭）等六人爲編纂。前二人是客籍編纂，白映星等四人爲綏籍編纂，分別依照既定計畫及步驟，積極展開工作。據說到民國二十二年該館所編之「綏遠省通志」，已定稿十分之七、八，再有半年時間，本可編竣印行；同時，李氏的編纂方法很新，其所定體例門目資料表格等，都可爲吾國方志開一新路，如能照原定計畫進度編纂印行，新志早已流傳國內外，無論體例及內容必爲綏省生色不少。不料通志館不以省志爲重，竟鬧人事糾紛，於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呈准傳主席生結束裁員，停頓全館工作，止發人員薪俸，使省志功虧一簣，實屬可惜之至。嗣於同年八月復館，再籌款數萬，延期二年完成，除客籍總纂及編纂憤而去職外，綏籍人士仍復任原職

，并改聘傳增湘教授爲總纂，繼續編纂，延至二十五年始將「綏遠省通志」編竣，由傳增湘先生携至北平付印，究竟已否印行？迄今尚無可查證之資料。綏省各縣市新編之縣志稿，未於抗戰前印行者，可能均於戰亂中散失。在台灣地區各圖書館收藏的及出版社影印的綏遠全志及縣志，多數是清朝編印，而且爲數不多。至於家鄉文物古蹟，於大陸淪陷後又遭匪偽摧殘，其能幸存者恐已爲數不多。若不及時搜集整理，訪問記述，深恐日久湮沒。將來編纂省縣志書時，只有徒喚奈何，「文獻無徵」了。因此，爲了保存省縣志書延續地方文獻，也應該有一定期刊物，報導交換，藉廣流傳。

我雖然很少與同鄉們見面聊天，但一向很重視同鄉的聯繫，三十七年底來台後，就隨時登記綏遠旅外鄉之住址，於三十九年我首次編印了「綏遠旅台同鄉通訊錄」，分送各同鄉。四十一年有一萬四千位反共義士由韓國接運來台，我會經會同同鄉前往楊梅等地慰問反共義士中之同鄉，除致送慰問品外，並各送旅台同鄉通訊錄一本。當時因此一小冊散發，使許多同鄉得到聯繫，而且陸續聯絡到在台同鄉，也就逐漸增加到五百餘人之多，除陝北、固陽二市縣外，其餘各縣市，都有同鄉在台。爲便於聯繫，白祥、李兆興兩位鄉長又於五十四年將通訊錄重新整理編印一次。十二年來在台同鄉之家屬及住址，多已變動，聯絡通訊，至感不便，故第三次重新編印，確有必要。同時，旅居海外同鄉，也逐漸增多，旅外同鄉通訊錄的編印範圍，自宜擴及海外同鄉，使國內外同鄉得以互通聲氣，相信於反共復興重建鄉邦大業上，裨益必多。而且我認爲「綏遠旅外同鄉通訊錄」，也是地方文獻資料之一，於「綏遠文獻」關係甚大。「綏遠文獻」係定期刊物，通訊錄不一定每年重編。而且處於今日之工業社會中，每一個人的住址變動，有與時俱增之趨勢。要想資料調查齊全，編印一部在一定期間內住址不會異動的通訊錄，實屬困難重重。就以我去年十月發出的通訊錄調查表而言，迄今已一年有餘，填復調查表的同鄉只有原來發出去的一半。其餘一半的三分之一，是行蹤不明失去聯絡，原信退回；另一個三分之二，是明知其住址未變，但其家屬有無異動，無從知曉，不能代填，雖經催促，迄未填復，也許是由於工作忙碌所致，也許是誤以爲住址及家屬既無變動就可以不必填表答復。因此，我們不得不變更原定計畫，即在通訊錄未重編以前，旅

外同鄉之住址及其家屬異動較多時，由「綏遠文獻社」彙齊印發異動表，或於「綏遠文獻」中專欄報導，更較適合需要。如此，同鄉們的住址及其家屬異動情形，就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互相了解，不致失去聯絡。

基於上述看法，我在同鄉們全力支持指導之下，創辦了「綏遠文獻社」，一方面調查登記包括寄居國外之綏遠旅外同鄉異動情形，定期報導，以便隨時聯繫，交換有關綏遠文獻資料之意見。同時每年定期編印「綏遠文獻」一至二期，專門報導有關綏遠之歷史地理、山川氣象、學術文化、鄉賢事蹟、年譜家譜、名勝古蹟、工礦農牧、吏治保甲、民情風尚、歌曲工藝以及旅外同鄉之各種成就與活動等等，藉廣流傳文獻，而使整編方志，如資料齊全且有餘力，還可再作進一步之影印或整編工作。惟上述近程及遠程計畫，需時費錢，任重道遠，當然需要綏遠全體旅外同鄉，共策共勵，始克有成。本來這些編纂志書及搜集文獻工作，在平時應由地方政府負責辦理的，當然私人亦可創辦此類於公有益之文獻刊物。但是在此時此地，故鄉未光復重建以前，有關延續地方文獻及加強愛鄉觀念的工作，我綏遠旅外同鄉，自屬責無旁貸。

追念研究邊疆學者胡耐安先生

金兆鴻

我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五千年來建有王朝者，實不一其族，其中滿、蒙且曾入主中原，與內地漢族融合混化，而成今日之中華民族。由於幅員遼闊，自有其所謂核心與邊疆之分，數千年來，治核心地區之學者，比比皆是，而治邊疆之學者，則寥若晨星，晚至遜清咸同之間，雖有何秋濤、張樞等輩從事邊疆史地之研究，但多侷限於現象之陳述，而乏理論之分析，是以邊疆之為學，自遜清至民初，始終未受重視，宜乎近百年來日本謀我「滿蒙」，俄國奪我外蒙、新疆，英、法圖我西藏、雲南、邊疆竟無寧日，終於禍及神州陸沉，邊政於國家之關係何其重要。

邊政之為學，其與我國之長治久安，有不可分之關係，因此自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於民國廿年私立朝陽大學即創設邊政學系，嗣後國立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及西北大學均設有邊政學系，政治大學在南京時也設有邊疆修班並附設邊疆學校，培植邊政人才，比及政府遷台，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校，即設有邊政學系，我政府實已洞燭邊疆與國家之關係，亡羊補牢實未謂晚。

近代能洞燭邊政問題之徵結者，當首推胡耐安先生，胡先生原名有祉，安徽涇縣人，啓蒙時，塾師為更有譽，嗣以其父「惟忍有濟，能耐斯安」遺言，遂以耐安為字，別署遼園，六十後號遼叟，七十後復署樂翁，藉示自足云。先生早歲東渡扶桑，自高校而帝大，返國後歷經黨政要職，但先生視富貴如浮雲，不樂仕進，仍以治學執教為志，歷經國立暨南大學、中山大學、省立安徽大學等校教授，四十四年政治大學在台復校後，擔任首任邊政學系系主任，歷

記得去歲年二月二日（正月初三星期一）台北區綏遠同鄉春節團拜茶會時，作者曾將創辦「綏遠文獻社」的看法與做法以及遠近程計畫提出報告，在場全體同鄉，無不熱烈贊助，支持進行。現在「綏遠文獻」一刊刊號，業已印行問世，希望全體旅外同鄉及熱心地方文獻的朋友們，鼎力支持，時賜教言；並希就上述各項範圍多賜有系統之專題研究，或對綏遠的人、事、物作片斷之報導，或交換有關綏遠方志及文獻資料，或示知有關綏遠方志及文獻資料之收藏處所。來稿文體不拘，字體不限，如係名勝古蹟，最好附寄照片。我綏遠旅外同鄉中尤其年輕同鄉在學術事業方面，如有特殊成就或其品德善行值得互相觀摩者，我們竭誠歡迎多多報導，如果自己不便出名，請將資料事實寄來，由本社代為整理刊布亦可，以供日後編纂地方志書之參考。

總而言之，我創辦「綏遠文獻社」的目的，旨在整編文獻，團結鄉友。整編文獻，可以保存文獻、傳播文獻、延續文獻，以促進文化之復興。團結鄉友，必須密切聯繫、互通聲氣、交換意見，於光復國土重建鄉邦上，裨益必多。

十五年，以年屆古稀，始循例退休，在此十五年中，杲此坐擁，化雨覃敷，成材甚眾，若政大邊政研究所所長劉義榮教授、民族社會學系主任林恩顯教授、中國文化學院龍寶麒教授等，皆出自先生門下，先生在邊政學園地之開拓，實已超越前輩，堪稱邊政大師。

先生治學嚴謹，兼以才思敏捷，讀書過目不忘，所著「邊政通論」、「中國民族志」、「邊疆宗教」等書，堪稱邊政方面經典之作。平時執教每以「履必有跡」勉其門弟子，先生風骨峻嶒，志節清操，平時嘗言：「綜我一生，差堪告慰我友好，遺我後人者，明辨一恥字而已。造次顛沛，不敢無恥，恥傍人門戶，恥隨人唱和，恥拾人牙慧，恥抄人語錄，如斯如斯，做人本份耳。」先生確已做到「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按先生平時執教絕不兼課，專心一以嘉惠學子，較之視兼課若「趕場」者，實不可同日而語。

本年初，先生以十二指腸潰瘍，日益衰弱，八月初虛弱益甚，乃入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發現腦血管病變阻塞，病情一度惡化，幸多方診治，轉危為安，嗣以不慎醫院環境，致持返家療養，不幸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病況突變，送醫不治，享壽七十九歲。

先生在邊政方面之成就，不在其身兼蒙藏委員會委員，而在其專門著作闡發邊疆問題原理之所在，以及培植研究邊政繼起人才。哲人其萎，典型猶在，望後起俊秀能踵其餘緒，發揚先生治學精神，光大邊政學術，則先生雖歿猶有榮焉。

編後記

本刊自創刊以來，向承宋念慈先生主編，爲時十餘年，從未脫期，殊堪欽敬。自本期起由編者等接棒，當依本刊既定宗旨，推進編務，尚祈讀者與著者惠賜指正。

以文先生「評介新版藏英字典兼談我們應有的努力」一文對新版藏英字典有精闢中肯的評述，極值一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者建議盡速編纂一部完備而精確之藏文字典，實屬切要。中國邊政協會對此曾作籌畫進行，惜以未獲國人重視，尚無成效，今後當再繼續努力。

研究邊政著名學者胡耐安先生於本年十月廿六日去世，胡先生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系主任，生平廉介勤學，著作等身，本期特載悼念文一篇，藉誌哀思。

旅居海外蒙藏同胞人數衆多，均熱愛祖國，本年十月復推派代表組團回國參加國慶大典，並赴中南部參觀軍經建設，對祖國各項進步實況，深感興奮，本期特刊載其在國內活動實況。

外蒙古被蘇俄控制已數十年，其現況如何，由於鐵幕深垂，各界諱莫如深，林佩音先生所譯「俄帝赤化下的外蒙古」一文，正給予較新的資料，頗值一讀。

哈勘楚倫教授所撰成吉思汗名號考證一文，引證翔實，頗值研究蒙古史者之參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六十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主編：徐 東 濟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